

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07 年

杜润生：理论思维活跃是喜庆气象

谢韬等：重建个人所有制

吴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报告

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联欢追记

目 录

一家言

- 1 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杜润生
- 2 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
……………谢 韬 辛子陵
- 6 如何重建马克思倡导的“个人所有制”……………应克复
- 8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评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吴 江
- 17 社会主义路线图……………钟沛璋

亲历记

- 20 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李若愚
- 25 我在全国人代会上犯错误……………邢 卓
- 28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友好联欢追记……………朱 良

人物志

- 32 钱三强三次受挫……………春 江
- 38 万里三到无为……………朱先央

求实篇

- 41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李昌平
- 48 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高 奇
- 51 社会选择出来的干部战斗力强……………冯东书

往事录

- 52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袁剑平
- 55 胡宗南的未遂起义……………朱汉生

文史苑

- 57 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为何失败……………郭晓惠
- 64 吴宓“偷书”……………何 蜀
- 67 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方 朔
- 73 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罗国璋

海外事

- 75 “我是纳税人”……………黄范章
- 78 法国知识界认识文革的历程……………陈 潇 郭冬至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



杜润生

杜润生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第二期的“一家言”栏目发表之后，引发了热烈的议论。这是很好的现象。这表明我们党的理论思维相当活跃。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

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不同观点充分展开，在思想上探索各种可能性，比较各家观点的优劣，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这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

建议《炎黄春秋》利用这个机会，提供各方面的观点和资料，帮助大家

活跃理论思维。

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但我很赞成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痛的历史教训。

这场争论有一个作用：搞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学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要不要瑞典式的社会主义？瑞典是800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但我们可以吸收人家的好观点，接受普遍适用的一般性经验。比如，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允许资本主义有适度的发展。我们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借鉴吸收各方面的好办法，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别的什么主义。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我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我搞农村工作，缺乏理论思维。我愿意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省太谷人，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宣传部长，同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后历任根据地多处中共地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秘书长。建国后任国务院农村办副主任，离休前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 杜导正）

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

谢韬
辛子陵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宣称公有制、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隐瞒马克思关于在公有制、国有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这一理论上的修改，后果极其严重。我们以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

马克思设想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

列宁、斯大林，包括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前苏联、东欧与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他们先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又对中小企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一切归公。

那么谁代表“公”呢？回答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谁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业的干部，以及领导这些企业干部的政府官员。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把本该回归社会的财富抓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控制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成为高度垄断的总资本家，全国人民都成为政府的打工仔。恩格斯早就告诫不要把“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设施

了(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2页)。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政治教育就是公有制、国有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公有制、国有化的比例越高就越好。这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适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营、中外合资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这些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质,不以赢利为主,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是混合经济,是所有制多元化。“一大二公”的追求是一种“左”倾愚昧。

不执行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这一条,实行绝对的国有化,这就注定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热情,注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永远赶不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注定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作为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原因可以说出许多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最根本的是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第136页),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与“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一切联系。劳动人民欢呼革命之后发现,政府成了“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自己的“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地位并没有变化,所谓“全民所有”是一种空话。这使人民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一个著名口号:“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不要人民参与”(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5页引)。执政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掌控全国财富;在舆论上执

政党还“代表人民”讴歌这种剥夺了人民一切的制度是“共产主义天堂”。年深日久,官有制企业必然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成为产生特权阶层的土壤。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必然会尖锐化起来。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

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执行马克思的第二步,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可以发展起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停滞衰退和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这一套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非的不是尘封的历史文献,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邓小平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比毛泽东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3倍。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左”倾主义、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真社会主义战胜假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还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还是这个中国,还是这些中国人,中国崛起了。2004年5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万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了21万亿元。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政纲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第二步是将土地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这和马克思主张的第一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第二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是一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纲具有极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的中国土地革命和农民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得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的那场全国

土地改革是正确的，问题出在立刻搞合作化和公社化，“一大二公”，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来，打破了农民建立个人所有制，发财致富的梦想，用共产主义的大话和空话教育农民。我们党取消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政纲，也就失掉了农民的支持，遭到了几乎毁掉一切的惨败。

为了使大家明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三分钱，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三分钱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二元五角三分，换不回口粮。全队二百二十四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人民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公有财产——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

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按照斯大林模式，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又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三年，饿死了3000多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在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几乎山穷水尽的日子里，毛泽东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6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和当时毛泽东的指示，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刘少奇等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害怕被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更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果然，危机缓解以后，毛泽东同志高扬列宁主义旗帜，批判“三自一包”，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大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被称为“三面红旗”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倒成了弥天大罪，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着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逝世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国为民做了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承认毛的话语权，让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喊着“三面红旗”万万岁去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但毛泽东同志一变话，刘少奇的盖世功劳立即变成弥天大罪。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今天我们就较较真：“三自一包”究竟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谁违反马克思主义？提到理论

上说,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三自一包”的继承和发展,是“三自一包”的发扬光大。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到城市国营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卖给个人经营,大企业改为股份制,都是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左派同志却一口咬定这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论据是列宁、斯大林,也包括晚年毛泽东同志的话。改革派直接去请教马克思。结果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是正确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才是社会主义的正路。倒是列宁、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的论著中,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许多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起码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是彻底地错了,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性失败证明错了,被苏联饿死1300万人、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错了。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搞的那个穷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不应成为衡量今日之是非的标准。我们要高举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旗帜胜利前进。

我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在13亿中国人民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大家尽可能多地积累一点财产。尽管客观和主观条件不同,富裕的程度也会不同,但要让大家共同富起来。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到贫穷的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财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都是假马克思主义,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背离。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目标是让全国人民,包括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牧民,都过上小康以上水平的生活;要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条件下,经过平等竞争,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就是出了比尔·盖茨那样的冒尖户也要保护。

避免两极分化是对的,但认识上有误区。有两种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所谓同向分化,就是大家的收入普遍增加,有的增得多

一点,有的增得少一点。反向分化是少数人增加,多数人减少,多数人减少的部分进了少数增加者的钱袋。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反向分化;对同向分化不能反对,这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一反同向分化,必然要走向平均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有人看到比尔·盖茨有500亿美元财产,住那样豪华的房子,就产生极大的义愤。他们没看到比尔·盖茨对美国、对人类作出了多大贡献。比尔·盖茨振兴了美国乃至世界的IT业,美国经济增长80%来自IT业,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问题。他和妻子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们拿出来救助非洲穷人的慈善捐款就达288亿美元,占他的财产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对这样的人没收财产,把他下放农村劳动,灭了个冒尖户。所以中国出不了比尔·盖茨。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还自我欣赏说我国劳动人民地位高。现在中央改变了这种狭隘的、短视的、哗众取宠的平均主义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提高的过程中,给有本事的人(他们代表先进生产力)充分的发展空间,制定《物权法》,保护他们个人合法所得的财富,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成功不仅属于个人,也给整个社会增加了财富,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不是修正主义,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创了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作者谢韬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辛子陵是国防大学四级研究员,本名宋科)

(责任编辑 致中)



如何重建马克思倡导的“个人所有制”

应克复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还是一个谜，这一点可从《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结论中得到证实。马克思写道，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过，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注1）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令人费解，学者们的解释于是众说纷纭，甚至有“无解的命题”一说。（注2）

这里的难点是：1.个人所有制与私有制有何区别？2.这种个人所有制如何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如何保障既共同占有，又为个人所有？值得注意的还有，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公有制。

马克思在对未来所有制的设想中，他对个人所有权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当时尚无实践经验，他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的情形不可能作出具体的描述。到了19世纪，一种新的所有制形态——股份制出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此作出了天才的分析。由于此种所有制问世不久，尚未成熟，对它的认识不可能到位，因此，马克思对未来的所有制依然没有提供清楚的答案。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股份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全面认识它的本质才有了可能。

股份制既不是传统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传统的公有制。传统的个人所有制是以个人（包括家庭）为单位的私人所有制。传统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代理的为共同体成员无差异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个人所有为基础联合形成的差异共有制。

所谓“差异共有制”，就是参与这一共有制的集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因投入份额不等的资产，因而享有不等额（差异）的所有权，因此，集合体每一成员对其共有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区是清晰的。这是与无差异共有制的一个重要区别。这种分散的资产经自由联合为一个集合的总资产后，为了投入生产经营，集合体必须委派代理者支配运营这一资产，这样，现代法人产权制度应运而生。于是，差异共有制就出现了两权分立——法人产权（支配权）与股东产权（终极产权）的分立，前者受后者委派并受后者的监督与制约。这是与无差异共有制的又一个重要区别。这种所有制，既具有财产所有权的个体性，又具有财产运营时的集中性；前者使每个所有者对其资产有着自然的关切，后者使企业实力雄厚，适应竞争。这种所有制，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远胜于传统公有制，因而在现代经济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总之，这种所有制其产权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产权的分散占有，而这种共同占有又由于联合体中个体占有的差异性超越了传统公有制中产权的混沌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优点又克服了两者的缺点而见长，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这种所有制的基础是个人所有，是个人所有者自由联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应归属于私有制的范畴，是私有制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新。

马克思当时对股份制虽作了深刻的分析，由于股份制促使资本的集中而产生了垄断资本，竞争又促使资本更集中于大资本家手中，尽管资本采取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但没有克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3)马克思的意思是,它为无产阶级剥夺这种集中的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后来,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产生的垄断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股份制必将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股份制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由“资本集合体”阶段发展到“资本集合体”与“劳动集合体”(此时劳动者也是股份所有者)相交叉甚至相融合的阶段。劳动集合体成员开始是企业高级主管与高级技术人员,然后向一般劳动者扩大,他们以股份额可索取相应剩余。这是股份制发展的第二阶段。此时股份制的资本还仅为物力资本。股份制的第三阶段是人力资本成为股份资产中的新伙伴,并分享企业的剩余(以前只为物力资本所索取)。就是说,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创利润,公司职员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剩余应属于公司职员。如此,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是企业主管与高级技术人才的智力资本,然后向其他劳动者扩大)不但可以获得工资报酬,还可以索取相应的剩余。这不但表明,股份制与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共存共荣,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种关系为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展现了可喜的前景。(注4)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在此不是成了现实了吗?

有人认为,股份制不是独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性质要由持有50%以上股权持有者的性质来决定。如果50%以上的股权属社会共同体或政府,它就是公有制;如果50%以上的股权属分散的私人,它就是私有制,如此,就有了公、私两种性质不同的股份制了。其实,鉴别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条件是看其是否实行法人产权与股东的最终产权的分立;这里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联合体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体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垄断了企业50%的股权,在体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

形式上)实行法人产权与股东产权的分立制,因而仍难以克服改制前国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这种企业虽然也可以活动于股市的舞台上(特别是市场与股市尚未发育、民间私有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但不过是披着股份制的外衣的伪股份制。这种股份制由于产权机制的缺陷尚未获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注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

(注2)见张燕喜、彭绍宗:《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马克思‘重新建立私人所有制’研究观点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99年第5期。

(注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8页。

(注4)关于对股份制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对股份制的评述,请见丁建中《新资本论》,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十一章。(作者是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屋 2007年第5期目录

书屋讲坛	宪法中的“矛”与“盾” “物权法”呼唤公共财政 《物权法》呵护民生的法宝	田 雷 司 晨 刘武俊
口述历史	我所知道的华罗庚与陈省身——徐利治先生访谈录 徐利治 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 访问 整理	
史海钩沉	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一) ——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 杨坚、朱元璋是节俭的皇帝吗? 陛下原是伪君子	夏侯叙五 梅晓东 柳士同 周泽雄
说长论短	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 世运变迁与文人隐疾 “谋道”与“谋食”	黄 波 丁 辉
灯下随笔	在现代性迷失中反思“封建主义” “三纲六纪”与独立自由意志 ——试释陈寅恪先生的思路	蔡蓬溪 张寅彭
书屋品茗	大小舞台 ——清末民初的梨园书写 传播学的本土化	刘大先 伍曦文
人物春秋	追忆父亲朱偁先生 姚克小传	朱元春 王炳毅
空谷回声	税收“三性”再认识 ——对《也谈税收》一文的回应 世间唯名实不可欺 ——“獠”字并非鲁迅所“生造”及其他 强扭的瓜不甜 ——评说《儿童杂事诗图笺释》	李炜光 万伟珊 李真波
茶余饭后 来稿摘登	怎一个“忙”字了得 欧阳修的严谨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齐庆民 焦辉煌 李启咏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h5314@263.net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评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吴江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公平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刚读到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写的(以下简称《考察纪要》)。这篇《考察纪要》的作者杨启先曾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进行考察,其得到的总的看法是:“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做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

这篇《考察纪要》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而且标题写明是“迟到”(即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发表出来),这表明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至今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我看来,《考察纪要》既然已经发表,而且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实无回避之必要,完全可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介绍

和评论,尤其在理论上。

一、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表述

在理论上,还是应当从1848—1850年法兰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后的形势说起。这就不能不多费些篇幅,然后再回到瑞典模式这个问题上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巴黎公社说得神乎其神,把它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典范,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确曾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并为此积极从事活动。但是看到1848—1850年法国革命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几次平安度过经济危机并且生产力还得到长足发展的事实,他们开始觉察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原先估计的那样,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马克思1850年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就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所以,当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工人阶级趁抗击外敌、反对资产阶级投降行为之际举行起义并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主要领导者为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时,马克思并不赞成,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当巴黎工人起义发动起来以后,马克思不是泼冷水,而是热情支持并歌颂巴黎工人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认为巴黎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同时还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性意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

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完全要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如何而定（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以及整个文明达到足够的水平）。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及进一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导实际运动的责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的肩上。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了。直到现在我们所称“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又从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个提法实际上淡化了恩格斯（虽然没有否定恩格斯），我想，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提法。《考察纪要》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口中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提法，我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总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啊！“列宁主义”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要讲到。这里要说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是如何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的，这是恩格斯一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在他最后几年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正像我的朋友徐琳主编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一书所指出的，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曾一度转入低潮，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工人运动才逐渐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基础上，欧美许多国家——丹麦、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典、瑞士、匈牙利、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先后成立了工人政党。这时的工人政党多定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没有定名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这也和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有关，1894年2月恩格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这个问题还有一段历史，这里不赘。1898年7月，由恩格斯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带头，召开有22个国家的工人政党

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其实这个组织完全是松散的，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的设立（此前被后人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协会还设有一个总委员会），连定期集会的制度也没有，各国党确认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思想基础，但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说到这时候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4年（即他逝世前一年）写的《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这篇文章提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时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经验，重新考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着重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把利用普选权作为“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声明，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恩格斯说明：这当然包括暴力革命权在内——吴注）。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之一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恩格斯：“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公正的。

恩格斯逝世前后数十年，资本主义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欧美各国工人政党也大多处于公开活动时期，能够尽量利用普选权这一武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重新遭遇危机，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第二国际”的大分裂——出现了所谓“保卫祖国”派和所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派的对立。后者是列宁提出的主张。当时除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外，从1918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也都相继爆发了革命并取得了短暂的局部的胜利，但最后都归于失败。惟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



吴江

胜利。于是产生了“列宁主义”的称呼（这是列宁逝世后的事情），并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对立。从此，就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正统派”）两个派别。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

这里不谈上述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其中反对修正主义是主要内容之一），也不谈苏联社会主义和基本上属于同一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及其取得的经验教训，这些，在中国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获得成功和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只想概括地谈一谈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也只能算是引言（因为这里也不是专谈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需要另写一篇专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23年“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并改名为“社会党国际”。从这时起，西欧工人运动就形成了两股势力（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之间）的对立，但优势和主要影响在社

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方面，因为它们不但吸收了绝大部分工人，而且其理论和活动比较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心理，资产阶级也比较能够接受。且不说这两股势力之间又斗争又合作（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合作曾是主要的）的复杂情况，就是社会党国际范围内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本身也很复杂，它们除了一概否定暴力革命和一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以外，各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初时大致还能奉行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由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后来则是各走各的路：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党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有的党则放弃了这一旗帜而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也在其内），并主张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多种途径；有的尚称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有的则称自己是人民的党或民族的党；有的主张同本国共产党合作，有的反对这种合作；等等。一些党曾不止一次地改组或重建，其倾向也前后不同。但是总的来说，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大致可看作是一种代表性倾向，这个宣言说：“不管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这里没有明确写明奋斗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是2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曾是肯定这一目标的，并说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

所以，总的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在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呢？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培育社会主义新因素，以便渐进式地（由量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来呢？我看可以这样说。当然，这种创造往往是试验性的，不会步伐整齐或呈直线上升趋势，随着形势的改变

或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会反复,有时前进,有时又后退。但有一个特点:即已经前进了的阵地即使在后退时也往往不会再全部丧失掉(例如:关于福利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总体而言,社会在不断进步。这里我举出两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一个是关于英国工党从1945年开始进行的一场改革;另一个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考察纪要》向我们介绍的瑞典模式。

英国1945年开始的改革(被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那是在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残破不全的情况下由英国工党领导进行的一场社会结构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地方供应企业及钢铁生产等实行国有化,即属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地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所谓“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障,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1948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宣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之名流行起来。根据确实的材料,当时斯大林同英国工党左派拉斯基的一次谈话,甚至承认这种改革可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因此,1951年苏共曾帮助英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过渡的纲领)。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方面,这种改革同时又使当时破败不堪的资本主义秩序得以稳定下来(按:此项改革当时是经美国默许并由美国资助进行的)。

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斗争之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有新的发展,自成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完成大致在60年代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它的代表作是1959年的舒马赫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思想体系就其内容来说比战前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的理论更适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广大中间阶层的心理,也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欧洲某些共产党,如意共、法共、西共提了“欧洲共产主义”口号,试图和苏联模式区别开来,走自己的路。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谈《考察纪要》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瑞典所采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了。

二、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概况

受苏联宣传的影响,我们一向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见颇深。其实,直至苏联解体为止,他们从未向我们客观地如实地介绍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包括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我在这里首先想说的是:其实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复杂而且多种多样,各国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瑞典并非处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而只是作为其“四肢”(“心脏”和“四肢”是马克思的提法),离资本主义强权角逐的中心地区较远,所以其社会变革较能自主进行而不受或少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影响。这里要特别指出一点,欧洲1923年成立“社会党国际”,其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解释原则上许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尤其主张“思想多元化”。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也承认“思想多元化”,但它仍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指导思想。这是其特点和优势之一。

对于人们很想了解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考察纪要》就其要点分题加以引述介绍,即采取“述而不作”的方法。我劝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切不可放过了了解这个异邦社会主义的机会。

关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考察纪要》写道:“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群众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

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本文最亮的闪光点。确实,世界上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决没有专制的社会主义——吴注)。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政策。”

关于瑞典的经济性质。《考察纪要》说:“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在1889年成立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几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进入议会而斗争’;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斗争’。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

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是与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遂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好的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高,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难。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章,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成为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几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了57%—58%。从而

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关于瑞典实行的分配原则。《考察纪要》说:“瑞典的分配原则,据他们介绍说: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又不能使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有点类似我们近些年一再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是: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即对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必须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的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因此,至今他们全国除了极少数优秀企业家,如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老总那样的人物,年收入可达上百万克朗以外,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的差距都不是很大。如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特别他们除工资以外,并没有其他级别津贴和职务消费,应该说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在介绍时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瑞典可以说已基本消除。对此,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经过到几类居民的家中实地观察以后,感到确实已大致如此。”

关于瑞典的福利制度。《考察纪要》写道:“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根据我们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说确实是‘名不虚传’。如(1)在养老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退休了,不仅可以依法定期领取足够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自理困难,还可以住进国家举办的养老院,除了可以免费就近享受各种医疗护理外,其生活条件不比我们现在的‘三星’级宾馆差。(2)在失业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了,不仅可以定期领取法定的失业救济金,而且可以免费通过国家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在全国范围内帮助他介绍新的工作。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技能条件不符,可以免费参加国家组

织的各种培训。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现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国家还可以资助给部分搬家费。

(3)在教育方面。不仅人人可以享受终生免费教育,而且法律规定,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只要有一个外籍子女在上学,学校就必须为其配备一位‘母语’教师,当然一般不是专职的,但每月必须为其讲一定时间的‘母语’课。大学教育,从入校到毕业,虽然有一定学年,但法律规定,只要学生认为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工作,不愿离校,就可以继续免费读下去。因此,据他们讲,现在每个学校几乎都有一批连续读了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大学生。(4)在生育方面。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以后,不仅可以享受长达一年半的带薪假期,其中一年为100%,半年为90%,而且在第18个月时,如果检查确认又怀孕了,还可以继续享受90%的带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18个月的带薪假期。同时,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较重要,不能或者不愿在家休息这样长的时间,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5)在监狱方面。对于被拘留者或者正服刑的犯人,不仅一切生活开支国家全部供给,而且每月还要发给一笔虽然不是很丰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现金津贴。正因为有上述这些社会福利,使全国每个公民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会风气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样子。据我驻瑞使馆同志介绍,我国在瑞建馆几十年来,在瑞的工作人员,还很少遇到过被偷窃的情况。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瑞典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从我们接触和听到的一些情况看,至少也带来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与矛盾。一是,这种高福利制度,是靠税收来支撑的。因此,瑞典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全国GDP近60%,在各国中也是最高的。即整个社会财富,差不多3/5都被国家集中去了,留给企业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最高的一档曾经达到过80%以上(现在还在70%以上),等于劳动者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绝大部分自己得不到。导致企业和单位在需要完成紧急任务时,除八小时以外职工一般都

不同意加班,认为加班增加的收入,自己得不到多少,不值得。有一些高收入的居民,如80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而不愿继续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国定居去了。二是,这种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利用它来获取自己本不应得到的利益。如我们在访问中曾造访过一户所谓最低收入的工人家庭,就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即这家人已经有了三个女孩,但女主人又怀上了。我们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问。他答复说,我早合计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划算。这不仅因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带薪假期,满18个月时如果又怀上了孩子,还可以继续在家带薪休假,等于我妻子长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种种繁杂的家务;而且瑞典政府鼓励生育,对多生孩子实行累进补贴制度,多一个孩子每月至少能多得一千多克朗的补贴,还免交所得税,这样可以明显增加我家的收入。当我们又问他:那对你有没有什么损失呢?他开始说:没有!待想了一会儿才说,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因为带上老婆孩子一堆不方便……这些情况说明,瑞典这种太多太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还有调整改进的必要。”

关于瑞典的社会公正。《考察纪要》说道:“瑞典的社会,从我们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在瑞典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1. 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例如: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正因为如此,瑞典首相也就是社民党的主席帕尔梅,在1988年底我们去考察前不久,在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铁到斯德哥尔摩最热闹街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出来顺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备进入地铁站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枪杀了,据说至今还没有破案。从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也可以带警卫。

“法律还明文规定: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国家才配给公务专车,其他人一律只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

用自己的车代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而且也杜绝了利用公车办私事的种种不正之风。

“2. 公开的舆论监督,有力地制约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在这方面,我们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奥地利时,在两国分别都碰到过一件具体的事例。在瑞典时,正赶上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应该分给住房的条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舆论曝光了,并公开批评这位工会主席是依靠社民党执政的特权搞以权谋私。为此,社民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开解释和表态,并由工会主席在会上据实说明: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儿自己搞的,当然,他也有教女不严之责,一定尽快督促女儿把这套房子退出来,其问题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从而才把这一事件基本摆平。”

关于政党和领导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考察纪要》专就这个问题写了他们在考察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要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的经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拨给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得到群众较多的选票,进不了议会,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要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80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他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 因法

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入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一遍,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是非常繁忙的。在1985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典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排场虽然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自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了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渡船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就率先跳下车去帮助群众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起来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考察纪要》的摘要到此为止。我想这对于了解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可以说得其轮廓了。

三、《考察纪要》读后感

谈到读后感,首先应当回顾恩格斯最后几年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所表达的期望。恩格斯当然不可能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后的种种新情况,更不可能预见到一场世界大战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点由西欧一时转移到俄国及经济落后的东方。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来寄予厚望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消沉下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道路如何走的问题重新提上了日程。运动不可能停止,但道路显然和十月革命迥异。这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记起恩格斯在1894年提出的重要策略——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并且重申“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仍是适合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战斗的工人阶级的需要的。当然,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运用这种策略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曲折的情况,这一点我在

上面已经提及,但是像《考察纪要》介绍给我们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获得的成果,至少说明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这种策略并非一无所获。因此,现在我们除了关心我们自己所获得的社会主义自身的经验(包括检查、总结和改革自身),同时也要采取科学态度虚心考察西方的运动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失败的和成功的)。两者因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同,固然有不可比的地方,但也有某些可比的或可以互相参照的地方。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考察纪要》本身也记录了当时考察者的想法和感想,兹抄引如下:

“通过这次访问,对瑞典社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情况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我们都感到收获颇大。但是,对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异同?对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修正主义与列宁主义、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分析与认识,也感到有些迷惑难解。为此,在当年访问结束回国的途中,路经巴黎时,我们曾经进行了一次



座谈，并邀请了几位我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会下的交谈发言中，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两种‘不谋而合’的说法和感想。至今我还认为，很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

“一种感想认为，第二国际理论与第三国际理论、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或者是有道理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前者即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代表的，基本上是当时一些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民主选举的制度，一个党派有可能通过选举，掌握议会多数，和平过渡上台执政，从而推行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上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或社民党、工党），都曾经过民主选举的形式上台执政，甚至比较长时期地执政，并推行种种社会改革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良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后者即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当时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还没有建立起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掌握着政权的反动派武装到牙齿，有权力肆无忌惮地镇压各种革命力量，不通过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推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但是，对于后者来说，有一点在指导思想必须十分明确，就是：用武装斗争的办法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只是起了一个‘催生婆’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并不‘够格’，即：（1）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不‘够格’；（2）社会主义要求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不‘够格’。因此，在通过武装斗争把社会主义政权‘催生’下来以后，必须下决心抓紧补上这‘两课’（这就是中国把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就是说，目前的社会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就是为了补上这“两课”，以便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吴注）如果能够这样地认识这个问题，在革命成功建设起新的政权以后，除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都要不失时机地集中精力抓紧抓好这两个方面的‘补课’，依靠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可能迅速地推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假若不是这样地认识问题，而是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政权，本身就是‘够格’的社会主义了，谁要是对此不同意或者表示某种疑义，就毫不留情地坚决加以排斥、打击甚至镇压，那就不仅很难建设成一个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且可能变成封建半封建式的极权主义，像苏联过去的斯大林时期那样。最终不仅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会遭到广大群众与干部的反对甚至扬弃。

“还有一种感想认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苏联式共产党与瑞典式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有如天主教与基督教一样，两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只不过是：前者主张坚持按‘老祖宗’的原话，一字一句地照本本办事，不得逾越，有点类似于一般讲的原教旨主义（这种说法似可再议。前者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恰恰不是按‘老祖宗’的原话办事；其原教旨主义倾向是表现在另一方面——吴注）；后者则主张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不断进行革新与创新，以更有利于扩大并推行‘老祖宗’理论的影响与主张，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

现在看来，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也各自存在着不少问题。上面的考察当然也是正面的东西居多。关于瑞典社会及其采取的模式，各种媒体也有一些负面的评论。如为了各种社会化事业，瑞典工人的60%的工资被强制性扣留；瑞典的增值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达23%）；由于劳动法过分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旷工率平均达到20%，劳动成本必然增高。此外，即使像医疗社会化这样的事情，低收入阶层向政府交纳了资金，仍满足不了他们最起码的就医需要。这个国家的财政赤字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几十年来的失业率高达15%，如此等等，都说明任何社会进步方面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至于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及其关系，自然是一个应慎重考虑和仔细研究的问题。

（本文写于2002年3月，收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沟通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作者惠寄时略加修改）

（责任编辑 吴思）

社 会 主 义 路 线 图

钟沛璋

人类为追求美好的未来，与社会主义有着不解的情结。远的不说，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至今，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在这以后，从19世纪到20世纪，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为之奋斗的政党和人民，不知有多少。中国从1903年《浙江潮》杂志最早提出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建立新社会之理论，“以增人间的福祉而消除厄难”，也有一百多年时间。从那以来，中国人民几经挫折，几经奋斗，一直在艰难地探索到达社会主义的路线图。

1949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回顾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大同的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惊震了世界，也极大地鼓舞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除了共产党人，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

走俄国人的路，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看到经济落后又经历连年战乱的中国实际，认为当时苏联的今天，还只能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先要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要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多种经济。搞社会主义还是以后的事情。毛泽东说，以后还要大

家开会讨论。但是全国解放没几年，还是按捺不住要奔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全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城里，连夫妻开的小店，都作为资本主义，要消灭干净。在农村，连农民的一点自留地，都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彻底割掉。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大搞“兴无灭资”，认为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就可敲锣打鼓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

这时原被认为是光芒万丈的苏联，暴露了黑暗可怕的阴暗面。赫鲁晓夫在苏共党代会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消灭异己、滥杀无辜的恶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受到极大的震动，纷纷进行深刻的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样走。

中国也参加了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讨论，发表被称为“九评”的许多雄文。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从苏联严酷的事实中，正确总结出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斯大林的刀子不能丢，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也就是说，还是要继续走俄国人的路。只是“苏联老大哥”的权威不灵了，中国人要放开脚自己走了，大搞“公社化”、“大跃进”，宣布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连爱说大话的赫鲁晓夫都紧张地说，要“与中国对对表”。这一跑步的结果，出现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死亡几千万人，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全国人民陷入了挨饿的苦难。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到灰心丧气的谷底。

严酷的事实迫使全党要进行冷静的思考。于是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以上7118人的干部大会，简称“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他原想“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他承认这是“违反了经济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

罚”。在大会将要闭幕时，毛泽东还要大家开“出气会”，鼓励大家讲真话，会上一些人讲了真话。刘少奇在会上说，并不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错误的。会上只有林彪唱调与众不同，他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

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召开这样空前的七千人大会而改变。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我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发出号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接着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作为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斗倒斗死，而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列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造成比“大跃进”、“公社化”时间更长破坏更严重的十年大灾害。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才松了一口气。原本是想奔往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大目标，回头来看，却是做了一场又一场连续二十年的大噩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的领导下，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纳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中国逐步走向繁荣。邓小平要大家冷静来对待社会主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中国目前称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出社会主义的路线图。中国农民在农村改革开始，就说：“摸摸肚子圆了，摸摸脑袋糊涂了”，现在走的究竟是什么道路。有人说是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是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着资本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说，先不要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先走着再说。

二

作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必须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才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奋进。这些年来，人们边实践、边探索，逐渐认识到原来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路线，有几个大误区，这正是造成大噩梦的原因。

一是以为只要加快改变所有制，就能跑步进

入社会主义。大家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马克思早在该书的序言中清楚地写道：“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你想灭就灭得了的，在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出来，还有强大生命力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在生存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不能拔苗助长，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就能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正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应该把经济搞上去。

一是以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道路。马克思在总结法兰西革命的经验时，是讲述过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话。但历史的发展表明，改革、改良、议会斗争，对推动社会前进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晚年就更重视议会斗争。

一是认为只有“一大二公”、公有制、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传统公有制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实践证明，无论是苏联、东欧或中国，传统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事实是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无份制”，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农民没有制。这与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不相符合的。事实证明，怎样分配，人民能否享受实际福利，才是体现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只有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提供社会保障，才是社会主义。没有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保障的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

一是认为搞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把民主、自由、人道统统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予以批判、抛弃。其结果是历经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忽然自动崩溃。而高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旗帜的中国，则陷入全国十年大动乱的灾难。

在中国，最早认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危害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曾任五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挥。由于指挥的错误，导致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

失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沉痛地说：“我自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执行国际领导人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从被囚于国民党监狱，一直到最后病死于四川江津，陈独秀经过多年的反思，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陈独秀又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不能分裂的。“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的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三

噩梦终于过去。重重的挫折，使人们终于认识到，我们不能再在以往的误区中徘徊。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构建了社会主义的最新的蓝图。可以说，这是中共在总结过去种种误区教训的基础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阐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未来的希望。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的现实，却与这张社会主义的最新蓝图相距甚远。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要为人民谋福利。社保、教育、卫生是体现人民福利的主要方面。目前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许多城市贫民没有社保，上学难，看病难，是普遍的现象。从社保、教育、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看，2003年德国为34%，法国为30%，俄国、巴西、南非、伊朗在10%-27%，而我们中国却仅7%！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公共卫生社会公平排名，我国在191个

国家中为倒数第4位！公共卫生投入，政府投入所占比重，发达国家为70%，发展中国家为55%，我国2000年为39%。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称社会主义我们还不够格。人们要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格？二十多年来，我国的GDP不是年年高增长吗？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了吗？我国高速增长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否用的都恰当呢？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恒提供的情况：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几千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嘱咐胡启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以上情况却表明，我国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是被官员们用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况呢？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西方政治家早就总结出经验教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因此西方国家十分警惕权力的过分集中、专制、独裁，而采取种种措施和制度，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而在中国，常常把这一切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对此噤若寒蝉。邓小平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又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样的论断，与几十年前陈独秀早就指出的“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的论断，是一致的。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再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必须对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进行改革，才有实现的保证。

（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

李若愚



中年时期的薄一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处做秘书工作。在我之前已有两位来自老解放区的“三八式”（就他们的资历说的），在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老区的青年。我们四人组成一个秘书班子，我们的年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时也出现差异，但对一波同志的印象却很一致。

忙忙罹险阻，往往耗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波同志是个大忙

人。他的会议多，经常要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召开的会议，这些会议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请假的；还有对下属单位传达中央的指示、决议，布置工作任务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时间都要求紧迫；此外，还有他兼职单位的会议、社会团体邀请他做时事政策讲演的会议；个别人的请示面谈等等。除了会议多，需要他批阅的文件、电报也很多，每天都有几卷宗。有时候他实在批阅不过来，就由秘书替他摘要，以节约他的时间。那一时期，一波同志是无所谓节假日的，工作随来随办，甚至夜里睡了，还把他叫起来。

他为什么忙成这样子？因为兼职太多了。他是中央政府委员、政务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中央编制委员会主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中华全国合作总社理事长、中央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这么多的头衔，都是实职，没有挂名虚衔。所以他很忙是自然的。忙，不一定是坏事，但太忙了就难免忙中出错。那时我们几个秘书中，就有人预言，这样下去非出漏子不可，不幸而言中。没有过多久，就因为财政部修正税制工作做得不细，出了差错，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几年后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那样的高级干部之间的党内斗争，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震惊得目瞪口呆。有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对我说，当年延安整风就是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判从严，结论从宽，最后处理还是会实事求是的，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沉住气，咬紧牙挺住，绝对不能寻短，否则，人死了，还要说你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与党对抗到底，永远也说不清了。不曾想到三年五载之后，我也遇到了几次无妄之灾，多亏听过那位老同志的点拨，我才死里逃生。这是题外话了。

经开始，我们需要的各种专家，缺口很大，即使再聘请更多的苏联专家也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潜力的同时，迅速培养起一支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办法是，凡是聘请了苏联专家的部门，要由主要领导干部向苏联专家提出工作难题，并同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领导干部向专家学习的好机会，是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条件允许时，集中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共同攻关，解决难题，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提高中国专家的水平；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请苏联专家给各级干部做专题报告，既可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又可提高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还要开办各种训练班，请苏联专家讲课，带徒弟。经验证明，这些办法都是成功的。这是当时解决我国建设人才短缺的应急办法。正是由于培养中国专家的工作，较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的时刻，我们才没有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这中间一波同志的呼吁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

一波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工作，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光荣历史。但他也从敌人的监狱里几进几出，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与阎锡山建立的特殊的统一战线，他创建的太岳根据地，他组建的山西新军等，在抗日战争与反阎斗争中，功不可没。所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很器重，认为他少年英俊，有培养前途，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提名他做中央委员（原候选人名单上，薄是候补委员）。党中央迁到北平后，又要他列席书记处会议，参加书记处工作。如1949年7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新政协党组干事会，一波同志被指定为干事会成员，和陈云同志共同负责联系财经方面的中共党员。1951年12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下列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中

央还指派他去上海检查“三反”、“五反”工作，去广东处理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等等。这都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是有意识地培养他挑重担的。一波同志也兢兢业业地工作，真像一位劳动英雄说的“小车不倒尽管推”了。

但是，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一波同志栽了一个跟头。此后毛泽东尽管说“解除了对他的误会”，仍然给他重要的工作，但再也没有昔日的“红火”。在“文革”中，薄一波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家破人亡。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前，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实行新的修正税制，事前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引起市场物价上涨，人心波动。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他说的“公私（经济）一律平等纳税”那句话，被毛泽东揪住，把它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党内分散主义的表现。还说薄一波是被资产阶级精神上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人之一。

毛泽东批判薄一波同志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决议上说，资本主义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把这句话去掉“纳税”二字，绝非疏忽！），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

我们不应忘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3月召开的，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经济政策（第26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共同纲领》又提到，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条）。按我的理解，对私营经济，“决议”突出的是限制，《共同纲领》则强调的是利用。两个文件出台的时间差只有半年，可以大胆地断言，人们对“决议”的精神还没有吃透，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要接受《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决议”，但《共同纲领》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国社会贤达共同制订并通过了

的,它也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

所以,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的八条批语,条条都是“袒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需要的、有利的……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其他则一般的应一视同仁……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这个利是超过了资本家的利益……一视同仁,或是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26条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共同纲领》要求鼓励私营经济经营的积极性,如何鼓励呢?对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给以高官厚禄、给他们当政协委员,可以起鼓励作用,但这只能是少数,对绝大多数资本家则缺少实惠,他们积极不起来。《共同纲领》还要求扶助私营经济发展,如何扶助呢?靠口头宣传是不够的,要有真东西。所以鼓励也好,扶助也好,最有效的办法(政策)是使私营经济即资本家有利可图。至于这个利,利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是需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在没有研究好之前,资本家得到的利只要合法就是符合《共同纲领》的。执行《共同纲领》的效果,可能有好坏的差别,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给执行者定罪。如果一定要说执行《共同纲领》的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那么,《共同纲领》就先犯了,是谁之过?如果一定要资本家无利可图,那就是否定了《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否定了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的意义。一定要这样干也可以,但要经过一定的步骤、程序,打个招呼,先把干部的思想认识扭转过来。不然,就是“不教而杀”。

前面说过,毛泽东把“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紧缩成“公私一律平等”,去掉谓语,就可以使事物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本来说的只限于纳税,现在就可以无限扩大平等的范围,好给人罪上加罪了。不仅如此,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讲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同时,

他又说“有所不同,一视同仁”,不再提“不分厚薄”;有所不同的含义也和他原来说的不一样了。

应该指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伸缩性很大,缺乏实施细则(一波同志在1950年中财委干部会上就已提到这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掌握。所以就出现当资本家高兴的时候,干部们“右”了,该打;当资本家叫苦的时候,干部们“左”了,也该打。要既不“左”也不“右”,恰到好处,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心意,难矣哉!所以有些人才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宁左勿右”的保身法。幸亏私营经济很快就被消灭了,无意中拯救了许多的干部。

在那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有人批判“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说它实际并不平等,因为国营经济的利润要全部上缴国库,而私营经济的利润则全部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另外,国营经济还要承担政治任务等等。这当然说得很对。但是,人们也可以反问一句,既然如此,人民革命胜利后,立即把私营经济消灭掉,岂不干脆?答案是,不行的,毛泽东说了保留私营经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具体说就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这是大道理。批判者心里很明白,但他们不得不那么说,因为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统一口径,证明毛泽东挑起政治斗争的正确性,这些人是有苦衷的,不难理解。遗憾的是时隔多少年之后,还有的学者写文章,居然比毛泽东还干净利落,把“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砍掉了后半拉,剩下“公私一律”,然后加以发挥,这大概是被前贤误导的结果了?

在党中央讨论那次财经会议的总结报告时,毛泽东问一波同志有什么意见?一波同志说,我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处分,但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毛泽东没有表态。我想这个“公私一律”就是当时最没有说清楚的问题。

忧患意识,老而弥坚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波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一次我去那里探望他,主要的话题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是由我的一句话引起的。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刘少奇要你们出狱,要你们在敌人拟好的

《反共启事》上签字，所以千错万错都应记在刘少奇的账上，不应该叫六十一人负责。一波同志说，不，不是那么回事。他随手取出他已经写好了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给我看了。然后他说，明白了吧？我们出狱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很清楚，刘少奇是执行者，他无罪，我们也不是叛徒。这时我俩都陷入痛苦的沉默之中。过了一会，一波同志说，我们的问题能否解决，还在两可之间，既不能悲观，也不能乐观。假如主持其事的人有私心杂念，那么几何公理也可以推翻。但个人的问题毕竟是小事，所担心的是党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前途将成什么样子！那时，我这个小百姓还在“牛鬼蛇神”之列哩。难以慰己，更何以慰人！但党运不兴，国家就没有出路，百姓的灾难就未有穷期，这一点我从一波同志的话里加深了理解。

以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这个小百姓也重见天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探望一波同志，直到1991年的6月1日，廖斗寅、郝正庭、张博荣和我去中南海探望他。那一次，大家皆大欢喜，谈笑风生。一波同志把他的著作《领袖·元帅·战友》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送给我们。中间，一波同志谈到他几次外出视察时所见到的改革开放后的可喜气象。他还回忆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关于国家兴亡的周期律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波同志居安思危的表现。

1996年，春节期间，杨济之、郝正庭和我一起到中南海探望一波同志，我们到时，会客室里已经有两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在座。一波同志的开场白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两个人在一起，说真话；三个人在一起，胡说八道。今天我们是七个人在一起也要说真话。接着他就说，毛主席一生说过许多话，有对的，也有错的。他有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人人都会犯错误，当然错误有大有小，要争取少犯大错误。然后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了不起的时代，一个叫“贞观之治”，一个叫“开元之治”。前者只有23年，后者也不过32年，连半个世纪都不到。一部中国历史，乱多治少！他又念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他居安思危意识的又一次流露。因为等

着一波同志会见的客人很多，我们就告辞了。

1998年，一波同志要我参加他的革命回忆录的编写工作，在我向他汇报他参加新政协，安排党外人士那段经历时，他又提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又念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使我感到一波同志的忧患意识，随着他的年事日高而更加强烈了。那年一波同志92岁，记忆力好，思维清晰，他对书稿逐章逐句的审阅、推敲，他指出的缺点错误，使我口服心服。比如：他指出“1949年，是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载入史册”这句话说，不对，蒋家王朝并没有覆灭，只是被赶出大陆，他跑到台湾又搞起一个“政府”嘛。他又指出，“大跃进中有的同志的头脑比我还热”，这不是说我的头脑也热了吗？书稿中提到毛、刘、周、朱、任五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波同志在五位后面加了“建国后”三个字，把话说得更准确了。这样的事例还有，使我深感自己的浅陋。一波同志告诫我，参加写作班子，不是叫你什么都听我的，要有自己的鉴别，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行文一定要实事求是，浮夸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概不要……

我在一波同志身边工作，前后有八九年时间，他值得我崇敬的除了他一贯的勤勤恳恳，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外，还有在“一言堂”时代，他能对某些决策保持自己的看法。1957年，我被定为右派分子，见到他时，我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一波同志不以为然，他说，不要那么想，所谓的右派分子不过是思想上有点右倾而已，什么敌我矛盾，内部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我仍然认为你是好同志，不要灰心丧气，你一定会回到党内来的。当时他对我这样的安慰，使我重新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没有自暴自弃，妄自菲薄，二十年后，一波同志的话应验了。我怎能不由衷地崇敬他！

我与一波同志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我不敢说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只是感觉到我的一生中还没有遇到第二位这样的良师益友，从这点上说我是幸运的。如今良师已经作古，学生已是风烛残年，只能将无限的哀思，都付予滚滚的历史长流了。

（责任编辑 吴思）

我在全国人代会上犯错误

邢 卓

1978年秋，河北省的一次“人代会”上我有幸当选为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那年我二十六岁，这年纪从某个角度来说可属大龄青年，但在全省的131名代表中就是地地道道的“小字辈”了。由于“少不更事”，此后五年的五次会议当中我冒冒失失犯了两回错误。错误犯在这种场合，着实让人“心有余悸”。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是又酸又辣又麻涩。

头一回犯错误是在第一次会议期间，时间是1979年3月末。那年河北代表团的驻地是西苑大旅社，在此下榻的还有另外四省市（北京市）的代表团，共五百多位代表。这天晚上，议了一天国家大事的代表们茶饭过后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下面精彩节目的开始。那天的娱乐活动安排的是一场美国电影，片名是《巴顿将军》。当时“文革”浩劫刚过不久，许多东西仍被列在“封资修”的范围，文艺园地还是荒芜一片，看烦了八个样板戏的人们渴望着新鲜的精神食粮。而“人代会”遂人所愿地使用了些特权，天天晚上给代表们安排一场外面难得见到的节目。况且《巴顿将军》这部片子早听说十分好看，市场上未准公演，这精神大餐怎能不惹得人们胃口大开？

开场时间快要到了，我正准备出屋，电话铃骤响，是居住在京城的一对夫妻打来的。男的是我家乡保定的一位好友的侄子，其叔曾向我交待说自己的大哥多年来一直有冤情在身，希望我在“人代会”上替他上达实情。我认为这是人民代表义不容辞的责任，打来电话的这对夫妻就是来向我反映情况的，他俩已候在旅社门外。

按会上的规定，会议期间外人是不得随意进入代表驻地的，有事只能在旅社门口的接待室谈。我在接待室与这两人会了面，他们开始向我讲述自己父亲蒙受不白之冤的来龙去脉，并交给



邢 卓

我一份材料。本想快刀斩乱麻地接待过他们就去看惹人心痒的《巴顿将军》，可二人话语滔滔，没有一点离开的意思，我也不好撵了他们就走。犯了一会儿难，我问二位：“你们想不想看《巴顿将军》？”他俩一听有内部电影，来了精神，说：“太想看了。”我说：“那就看完了再谈好不好？”他俩说：“太好了。能进得去吗？”我说：“想想办法吧。”由于看片子心切，我完全忽略了会议的不准外人进入的纪律，觉得人民群众又不是什么危险分子，人民代表本应和他们水乳交融。就急匆匆跑进大门，在小礼堂门口截住同团的两位代表，要求借他们的代表证用一用。因为进入西苑大旅社的大门必须出示代表证，本届大会代表证上没贴照片，在门卫面前只是晃一晃红本本即可，不曾见他们仔细查验。两代表听我讲明情况，很是犹豫，但抹不开面子，就把他们的代表证拿了出來，我急忙跑回接待室，秘密地将证件交给夫妻二人，

让他们在外面溜达一圈，我先持证进了大门。五分钟后他们也顺利进入，并告诉我通过门卫时心情比较紧张，我说肯定没事，这里住着五百多名代表，门卫不可能个个认识。说着乐着一同进了小礼堂，巴顿将军已经演了一截，令人遗憾。

电影散场，又聊了一阵，夫妇俩还了我证件就往外走，我回了自己的房间。工夫不大，有电话来招呼我到传达室去一下，挺纳闷地到了那里，见到了那对夫妇，一位四十多岁的大会保卫人员问我：“他俩是不是代表？”我一听知道出了问题，支吾了一会儿承认了借证给他们的事实。保卫人员问我他俩的身份，我说：“问他们自己吧，我不是很清楚。”保卫人员没对我再说什么，去隔壁和不知什么人通了电话。过了会儿河北团的秘书长过来了，和保卫作了交谈，把我领了出来。在院里秘书长说：“你小子，惹祸了，等着挨批吧。”我说：“不就领进个人来嘛，人家是反映情况来的，又不是阶级敌人。”秘书长没理我，说：“睡觉去吧，明天再说。”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今天我这错误的性质能有多严重？人民代表接近一下人民群众能算是啥错误？这夫妻俩是怎么被保安看出破绽的？代表中也有看完电影出旅社遛达的，出门历来也是不验证的，怎么偏偏盯上了他们？零点过后公交车就没了，家住东城的夫妇俩怕是要徒步走那十几里路了……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打探那夫妇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后来，他俩打电话给我，说被滞留了一夜，当晚就有人向他们所在单位作调查，幸好两人政治上都非常清白，女的还是共产党员。我的处境也不妙，被代表团团长刘子厚叫过去训了一通，开始我还嘴硬，说干嘛这么小题大作，刘团长的眼珠子就喷了火，说：“告诉你吧，大会秘书处要通报这事，这下全国的代表都知道你了，你可出名了！”至于吗？我嘴上这么说，身上惊出了一层冷汗。

几天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简报上果真发出了对此事件的严厉批评，我一下蔫成了落汤鸡，那两位借证给我用的代表也受了敲打，后悔不迭。这天碰上与刘子厚团长同桌用餐，他说：“还不通？”我说：“通了。”他说：“怎么个通法？”我说：“以后得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说：“这

就对了。”我说：“这阶级斗争得讲到什么时候呢？”刘团长脸色又紧了，说：“你好好学学毛主席语录去。”

第二次错误犯在第三次会议上。保定的代表中有一位名叫赵汉章的，是某县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此人思想觉悟高，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吃得透，领导方法上也很有一套，他带领的那个村庄革命生产搞得都不错。到北京后，我和赵汉章同住一个房间，他长我十几岁，是党组织里的人，又多年做群众带头人，自然比我成熟不少，对我也就多有些指教。一次分组会上，一位河北籍中央领导参加河北三组的讨论，期间他针对有些代表提出要加速发展家电工业，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意见作了发言。他说：“目前中国电力十分紧张，而发展电力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较长的一个周期，如果冰箱彩电洗衣机什么的走进千家万户，就会使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就会影响到工农业生产，所以家用电器还是暂缓发展为好。”首长的这席话赢得许多附和之声，我却心生异想，于是发言说：“请问首长家里有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首长笑而未答。我说：“领导同志用起家用电器来会感到方便舒适，老百姓也同样有这种需求，不能自己用上了，就不考虑别人了吧……”话说了一半，我的腰眼被人重重地捅了一下，是身边的赵汉章干的，我意识到言语有失，截去了下文。一时间室内鸦雀无声。首长虽然仍是风仪不改面色可亲，却有一股冷气环绕场间。某市的一位领导打破僵局慷慨发言，对我的“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驳斥，接下来又有一些同志对我观点作了批判。会散了，回到宿舍，赵汉章立马对我作敲打，他说：“先甭说首长的话有道理还是你的话有道理，你就不能在这种场合发这种言。你以为你是个人大代表就不赖呆了，想说啥就说啥了，你这个代表能当不能当还不是人家一口唾沫的事儿。”我说：“大会要求畅所欲言嘛。”赵汉章语重心长对我说：“你还年轻呀，好多事情还不懂，你就听老哥的，嘴上上把锁，别总让老哥心惊肉跳的替你担心。”虽然对老赵的话我是似懂非懂，可心里真切地感到他对我的关爱，情感上又与他贴了几分。

老赵有酒瘾。“人代会”上的饭食菜肴很丰盛，可平时并没有酒水供应。老赵在家时三天不

沾酒会浑身难受，来这儿忍了几天就实在奈不住了，再不喝上几口怕是连觉也睡不着了。这天晚上，他从小卖铺买了瓶白酒揣回宿舍，咕咕往肚里灌。我当过内蒙知青，在塞北也炼出了酒量，不能让老赵孤独寂寞，便与他同欢共饮。住旁边屋的代表来串门，架不住酒香诱惑，也加入了啜饮的行列，很快又有人嗅到味道跑过来过瘾。原来瘾君子还真不少，索性来他个酣畅淋漓，大家就凑钱再去买酒买菜。几巡过后，鸡骨头、花生皮扔得满桌都是，等大家酒足菜饱，我就找了几张纸把残渣剩骨收敛起来扔了出去。

几天后，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大会秘书处下通知让代表们把会议文件收拾整齐上缴。这是每次会议的惯例，而每份文件上确实都标有机密字样。文件除了议案草稿，就是一些会议简报，简报上多是些各省市代表的讨论发言，每份简报都按发放顺序标有阿拉伯数字，大概有三百多份。我把我的简报早早地整好，交了上去。赵汉章清理自己的简报后发现少了107和108两份，撅着屁股桌底床下反复找，找不见，急得满头是汗。我见他模样狼狈，宽慰他说：“简报不会自己飞出屋，丢不了的，慢慢找。”也帮他翻箱倒柜，折腾半天，还是一无所获，感到好生奇怪，简报能丢到哪呢？看老赵绝望得有点恐慌，我说：“两份简报，找不到就找不到吧。”老赵抹着汗说：“那可不行，这是机密文件，丢了不得了。”我说：“机什么密呀，代表们也都是工农大众，几句发言啥密可机，会上会下不都一样说，阶级敌人要它也没用啊。”老赵不听我的，寒森森地说：“我可是犯大错误了，犯大错喽。”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后悔把自己的简报早早交上去了，不然抽出一07，108，补给他就是了，我不是领导干部，背得起批评处分。老赵愁容满面，想去会务处自首，我出主意说：“既然如此，也别声张了，这么厚的一沓东西不可能挨页查呀，没人发现得了。”老赵想了想，决心依我所说蒙混一把了。简报

当晚交上，次日大会安排代表集体购物，专车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午前回到驻地，赵汉章接到通知，说他的简报缺份，让他赶快找到补齐。赵汉章一下又成了烫水盆里的蛤蟆，饭也没吃，满屋绕着打转转。忽然，他眼珠上翻，口冒涎水，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见到此景，吓得我大声惊呼，医务组的医生来到了，为他掐人中，号脉搏，刻不容缓地叫了救护车，老赵被抬出了大楼。

第二天早上，河北团的代表们收拾行囊，乘车往火车站去，想到被扔在北京医院的赵汉章，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我特意向会务组的同志打探赵的病情，得知是脑溢血，已控制，没有生命危险。踏上南下的列车，望着窗外春意盎然的田野，我一直在想，那两份代表的发言文稿，就这么重要？真算什么机密？那两份文件又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呢？忽然，我想到了那天大家饮酒作乐用来收拾鸡骨头、花生皮的几张“废纸”，对了，很可能那就是赵汉章失踪的简报，是的，一定是的！我的头皮一下子麻胀了起来，像是有一股热血也试图冲破大脑的管道，我手压胸膛，按抚住激跳的心脏，暗叹道，自己的这次错误非同小可呀，险些造成了关乎人命的大事，赵汉章知道我就是使他魂飞魄散的罪魁祸首吗？他心里或许已经是很明白的吧。天哪，来日与老赵相见，等着挨他的骂吧。

(责任编辑 吴 思)

资治文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主管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江西出版集团共同主办
《资治文摘》月刊，16开全彩印刷
单册定价8.00元，全年定价96.00元
邮发代号80-366，国内刊号：CN11-5301/G2

省长部长想什么？厅长局长说什么？总裁经理干什么？
一册在手，全部都有！



现在及未来领导人、管理者的必读经典

《资治文摘》秉持《资治通鉴》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理想，围绕领导人与管理者的阅读需求，荟萃图书、期刊、报纸、网络中最适宜的书摘、文章、时评、资讯，打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读经典”。涵盖资讯、政经管理类、生活休闲类三大版块，主要内容涉及：“月度人物、高层动态、人事动态、图片新闻、焦点、民生、财经、管理、论坛、历史、生活、文化。”

《资治文摘》强调实用性与可读性，力争给读者提供多维度的思考空间，对于不同领域及层级的领导和精英才均有裨益。

联系人：周青 高丽红 联系电话：010-65123806 / 65123855
E-mail: zq_626@hotmail.com gaolihonglu@163.com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友好联欢追记

朱
良

近几年来胡锦涛同志同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日本政治家会见时，曾多次强调双方青年间友好来往的重要性并达成了不少青年交流的协议。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指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中日友好的未来和希望，《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宣布，“双方就双向实施两国青少年大规模交流计划达成一致”。

重启 1984 年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后续活动

1984年9、10月，三千日本青年应邀来中国举行中日青年友好联欢。这是两国青年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促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群众性交流活动。很可惜的是由于某种原因，1986年底以后，不再提到这次活动，扩大这次重要活动成果的后续工作停止了。

事实证明，1984年那次友好联欢的成果是巨大的。当年参加联欢的日本青年现在已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积极为日中友好而努力。令人高兴的是，我全国青联已经邀请200名日本朋友于今年6月访华，举办“中日友好联欢”的后续活动。200人中大约半数为1984年友好联欢的参加者，半数为参加者的子女。还邀请曾经积极响应并推动“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实施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参加这次后续活动。

着眼于人民，加强民间往来，发出三千日本青年访华邀请

1982年7月发生了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日本侵华历史的事。日教组（日本教职员工会）带头勇敢地起来斗争，坚持应以真实的历史教育日本青少年。我国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当时邓小平提出：要发展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往来。前一段我们也确有对民间往来重视不够的缺点，要纠正过来。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根据“着眼于人民、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在日本青年的欢迎集会上，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秋访问中国。

在向日方发出邀请之后，中央决定由团中央抓总，对外用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日友协的名义。还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为第一副主任，全国青联主席、副主席分别为正、副秘书长。

邀请、组成和接待三千人的日本青年代表团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在日本，没有一个单位能统一负责组织和派遣；中方就直接向200多个日本团体、单位发出了邀请。邀请以民间为主，也充分照顾官方，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政府都被邀请了。这样，就把中日友好活动推向了日本全国。对朝野各政党，我们采取一视同仁，同等邀请。不要求各政党的党首担任团长，从而避免了各党派间在

日中友好问题上产生纷争。我们完全尊重日方对代表团人选的决定,并且照顾左邻右舍,既有各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老朋友的后代,也有国会议员。最后日本 220 个团体、单位派遣了 3017 人,组成 217 个代表团,包括 63 名记者,其中绝大部分成员是初次来中国的青年。日方认为,中方能把日本各派、各界、各地的三千名青年集结在日中和平友好的旗帜下访华,是很了不起的。

照顾青年特点,确立正确方针

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友好联欢十分重视,总结了历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 1965 年首届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经验,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待外宾那种政治说教、强加于人的教训,提出了正确的方针。

胡耀邦总书记先后六次听取了筹备工作的汇报,提出“友好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联欢活动采取“寓友好于交流之中”,要搞得“轻松、愉快、活泼、多样”。他强调要彻底改变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宣传中空洞生硬的政治说教和强加于人的做法;要学习周恩来总理在交朋友时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味的外交艺术。王震主任在筹委会上提出,要采取丰富多彩的青年喜欢的活动形式,充分表现中国青年热情、好客、奋发上进的精神。他多

次强调要让日本青年通过同中国青年接触和亲眼观察,来了解中国。

国家主席兼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先念对友好联欢也很关心。他说“日本三千名青年访华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经费问题,我提议由我方负担为好。”对这次友好联欢的费用,团中央精打细算,整个接待的财政预算是 803 万人民币。应该说,在当时搞这么大的活动,也是很节约的。王震主任主持了八次筹委会会议,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举行此次友好联欢,没有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要解决交通、安全、住宿(当时北京的旅馆还很少)等问题是不可能的。

团中央对友好联欢的日程和节目进行了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事先征求了日方的意见,对 150 多个代表团提出的 800 多条要求,尽量予以满足。例如:中文日文演讲比赛、围棋对局、集邮、时装表演、茶道、插花、对口交流、文艺演出等。团中央多次派人到外宾要去的六省市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全面情况和每个活动地点的情况。各地根据代表团的特点,安排了同行业友好会见、对口交流、体育比赛、参观游览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活动。日方 200 多个代表团,每个团分别参观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和一个学校,仅大学就有 120 多所。上海有 88 家农户请客人去做客并吃饭。友好联欢从 9 月 24 日到 10 月 8 日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



1972 年 9 月,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胡耀邦为日本中曾根首相访华题词：“中日友好代代相传”(1983年)

安、武汉六大城市举行。3017名日本青年分四路或从上海入境或由上海出境，高潮是在北京汇合，参加了我国35周年庆典，观看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因此北京和上海的工作特别繁重。整个联欢活动规模大，气氛热烈，感情交融，活动丰富多彩，突出了各地方的特点。在北京，王震主持了人民大会堂五千人的盛大欢迎宴会，胡耀邦在万人欢迎大会上讲话，会见了日方代表并同三千青年一起游园。日本朋友还应邀参加了国庆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广场同几万中国青年一起跳舞、唱歌、联欢。我国国家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分别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会见了日本朋友。日本青年来华时，中曾根康弘首相为他们送行并致电祝贺友好联欢的成功举办。

突出“情谊”，消除偏见

在举行友好联欢的1984年，日本39岁以下的青年人都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美军的占领下出生的。他们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而受到美国反华、反共思想、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生活方

式的影响很深。有的青年认为中国“神秘莫测”，有的人认为“中国人民生活在紧张和束缚之中，没有个人自由”，有的人认为共产党“不讲人情”。来中国参加友好联欢后，很多人亲身体会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全团有91人在中国赶上过生日，东道主为他们准备了生日蛋糕，祝贺他们生日，他们感动地说：“到了中国真像在家里一样”。聂荣臻元帅派人把他在抗日战争中救助的日本姑娘美穗子的女儿接到家里来，共进晚餐。日本著名歌手芹洋子带着两岁的女儿亚美来参加联欢，胡耀邦送给小亚美三件礼物：中式棉袄、奶糖、巧克力。类似的事情不少，看来是小事，但是充满着情谊。

通过友好联欢，深深地触动了日本朋友的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加强了中国青年对中日友好重要意义的认识，增进了双方的友好感情，播下了长期友好的种子。一些原来对中国怀有偏见和疑虑的人表示“要重新认识中国”，认为中国已走上经济建设的轨道，“实现‘四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有的日本青年表示“要做日中友好的接班人，要为两国世代友好奔走效力。”参加南京那一路联欢的日本代表团成员表示：“没有想到在曾发生过大屠杀的地方受到亲人般的接待”，因此更加“深感内疚”，主动举行“日中不再战”的宣誓。在上海机场离境回国的青年中有80%的人恋恋不舍，热泪盈眶。

联欢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作为老共青团干部，我认为团中央对这次有三千名日本青年参加的友好联欢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首先是对中国青年进行了深入的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教育，包括帮助中国青年学会如何同外国青年进行交往。其次各项组织工作也做得非常细致周到。例如，三千人来华前，就知道自己在各地宾馆的房号及参加活动乘坐汽车的车号。

在筹备过程中，团中央编发了面向群众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宣传提纲》，各地都结合实地情况通过媒体及各种渠道，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提纲》除了说明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外，要求广大青少年“人人关心联欢，个个都做友好工作”；要

以热情、谦逊、文明、友好的态度讲礼貌，注意行为美、思想美、语言美、风度美；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分子，要遵纪守法，不能做任何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要通过友好联欢，反映出中国青年高尚、文明的精神面貌。对所有接触外宾的青年，不给他们设定“框框”，而是把方针、政策交给他们，鼓励大家主动大胆地和客人交谈、接触，建立友好情谊。这样做使整个活动气氛轻松愉快，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联欢前，团中央为各地将近 900 名工作人员举办了一星期的训练班，对宾馆、汽车、铁路、航空、公安等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及外宾参观单位的接待人员也都根据“提纲”精神进行思想动员和教育。他们都表现出非常可贵、感人的顽强拼搏精神。

这次大规模的群众友好联欢活动，直接参加活动的青年有近一百万人。上海有几十万青年自发地甚至夜间十一点钟还在街头欢迎日本青年。在联欢期间，每天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次联欢活动实况的青年估计有上亿人。在 1984 年对外开放的初期，有这么多青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初步懂得了如何同外国朋友交往，如何主动做友

好工作，改变了过去看到外国人或者回避或者围观看热闹的情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批青年干部更是受到了锻炼，增长了对外活动的才干。

由于组织和思想工作严密细致，大家认真负责，三千名日本客人没有一个人发生意外损伤，汽车队伍没有发生交通事故。9000 多件（次）行李在接运过程中没有发生差错。客人丢失的 50 件物品被迅速找回，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国庆焰火联欢晚会上失落的 4 台照相机，也全部找回交还原主。

应日本两百多个友好团体的邀请，以全国青联主席为总团长的“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于 1985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2 日回访了日本。中国青年代表团有 504 人，来自 29 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包括了 56 个民族的青年。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中的 43 个。日本 200 多个

青年和友好团体、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及各政党的负责人、都道府县的知事、议长、市长都参加了会见或活动。中曾根首相出席了招待会并致词。曾参加友好联欢的三千名青年更是十分热心积极，并且带动了一大批青年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全日本有几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接待。这种举国一致的欢迎阵势是空前的，也说明了 1984 年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参加友好联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

友好联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参加友好联欢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两国青年各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来往也不少，但是团中央组织实施的 1984 年那场规模宏大的交流活动的经验还是很宝贵的，特别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对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对所有接待、接触外宾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的经验，对于举办大规模群众性国际活动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活动，都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地方。（2007 年 5 月）

（作者是中联部前部长）

（责任编辑 杜晋）

“赫衣”应是“赭衣”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劝君少颂秦始皇》一文中的“赫衣”应为赭衣。赭 zh) 衣，囚衣，也指囚犯。“赭衣”句出自《汉书·刑法志》对秦政的评语。原文是：“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生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日，每天；县，悬；石 dàn）之一，即一石 120 斤）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周式一

远景出版社在台湾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一文，“后来香港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香港”应为“台湾”之误。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台湾活跃着一批年青出版人。沈登恩、王荣文组建的远景出版社令人瞩目，后，王荣文另建远流出版公司，远景逐渐式微。王荣文的远流至今仍为台湾出版界之佼佼者。

龙文善

作者更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刊登的我写的《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有一错字，请更正。第 36 页左栏 5 行：“管理宽”，应为“管得宽”。这是我原稿中的错字。

陈健

钱三强三次受挫

春江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几年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告别的时候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共产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急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如果不方便，也不必勉强。”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的人，也是很严谨的，一般说来，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也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有了一点的信任，他热情地谈了两个多小时，

在几十年工作当中，他曾经向党组织提过几次意见，遭受过几次打击。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几十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党的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过分自以为是。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忽视民主，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党的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归根结底仍然是：老子打天下，老子要坐天下。”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的政治家，在夺取政权以后，不可避免的就产生皇权思想，视天下为私有物。钱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有些领导人思想上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皇权思想。

他的态度很认真，很诚恳，亲切地告诉我：

这样的问题，长期存在，有谁能够解决？我考虑很久：邓小平是有魄力的，但是，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有所认识，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权威；解决这个难题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周恩来。他又去世了……

我有一种预感：好像还要出问题。什么时候出？我说不定。我这样的年龄，有可能看不到了，你肯定可以看到。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安徽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想起几个月前那次谈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还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与发动地点，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我及时来到北京，老科学家热情地谈了六次，每一次约三个小时（半天）。

这是他最后的岁月，诚恳地讲出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一次提出建议 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见面，并一同在苏联考察。

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位科学家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2月，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都动起来,大鸣大放。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

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

“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钱三强每次谈到钱学森,都是这样亲切称呼)。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钱三强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

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因此,钱三强认真明确地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并且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也是可行的,是很有价值的。

刘晓同志走后,钱学森有些不解地悄悄问:“他们想干什么?”

毫无戒备的钱三强很坦然地回答:“礼贤下士。”

钱三强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只是想改进党的领导,纯属善意。可

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反党的言论”这顶帽子,就这样定下来了。

早在反右派运动以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一种不太协调的气氛。

二机部直接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的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来领导。这位老领导当然要向周恩来负责、归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根据中央的精神,一贯要求必须注意政治思想、注意组织纪律。

二机部的领导,也是根据中央的精神,第一个动作就是加强党对二机部的领导。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安排了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老区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是那位老领导的老部下。这位部长表面看来还算文雅,客气,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从思想深处来看,他是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的助手,担任原子能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这位年轻人,也是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这位部长助手,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这个科学院里,风气不太对头。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同志们都互相称呼“钱公、李公……”,是互相尊重的意思。这



1986年1月,作者在中国科学院访问钱三强

位助手就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参加会议,这位老革命对他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这位部长助理当时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是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几十年以后,已经开始逐步这样做了。但是,在当时,按照绝对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的原则进行思考,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既然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能够掉以轻心吗?

在号召干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些共产党员不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要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学习。但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他一反常态,讲出了这样一段话:“我历来讲,知识分于是最没有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说:“这些个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个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的批判是很严厉的。钱三强已经大难临头了!

领导人人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就参加地下党活动。邓发将军亲自到法国与他谈话,安排他如何回避国民党,如何与党联系;毕业以后,他在法国已经是博士导师,有汽车、有洋房、有优厚的待遇,科学研究的条件也很好,他却毅然回到贫穷的祖国,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回国以后,国民党的要员热情欢迎,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默默地躲进清华大学埋头教书。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时候,又派专机接他去台湾,他仍然躲避不去。他是衷心拥护党的,怎么会反党?但是,灾难仍

然罩在头顶。

运动的结果,几十万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

钱三强的右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钱三强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第二次批评 迎来沉重的灾难

反右派运动,对钱三强是一次很大的震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在思想深处他没法完全接受。这些理论上的升级,阶级斗争的加强,使他感到突然和诧异。

他想把政治丢在一边,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可是,政治这股旋风,总是来敲他的门,把他旋进去。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正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责任。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积极推荐、张劲夫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调动了四分之一的精干力量支持二机部的需要,主持协作的有裴丽生、秦力生、谷羽。

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在铀-235分离,

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探测技术安全防护等方面承担了责任。在钱三强领导下，钱皋韵组织科学院和冶金部研究机构，研究试制扩散分离膜。钱三强组织黄祖洽、于敏等一批理论研究人員，埋头工作，为氢弹的研制作了很踏实的准备工作。

1961年钱三强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有力地加强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

钱三强委托王方定制备强中子源，为原子弹的点火做好准备。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钱三强知人善用，工作相当紧张、相当繁重。经过了轰轰烈烈的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向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突然变得大胆了，勇敢了。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发挥了个人的（也可能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意）独立思考，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



原子弹爆炸后两小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名参加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的演职人员

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第三天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错误开始升级，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这种人，还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工作吗？

不仅如此，还有一条理由是：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二机部是要害部门，这种人，决不能再留在二机部工作了。

理由相当充分，决定把钱三强调出二机部，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这个计划当然也是经过那位老革命、老领导同意的。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在前一

年 1962 年 9 月 11 日),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 1964 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 年秋,我在全国人大办公厅访问刘伟同志,这位忠厚的长者,仍在忿忿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的这个计划,就没有能够实现。

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十分感激。周恩来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仍然保护钱三强这是很难得的,是了不起的。

第三次惩罚 沉重的打击

1963 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

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更加难以忘怀。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了。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祝。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 7 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10 月 19 日他便踏上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会、照了像,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来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花了一些智慧、经过细心研究的。那位老资格的副总理和二机部的领导人,当然是互相通了气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 1957 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钱三强小心谨慎地取出一张老照片给我看。这张照片,就是他在乡下摄的。那是在河南信阳农村一个生产小队里,三间大屋子,四面墙壁由于烟熏火燎,是一片黑色。墙上挂着一把镰刀、一个斗篷,四壁皆空,一无所有。钱三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静地依偎在一起。那种孤单、寂寞、凄凉,使人感到压抑,简直有点受不了。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老父亲临终也未能见上一面。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作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钱三强给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1964 年,原子弹上天。上午 × × 通知我,听听广播。5 点到 7 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 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

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自己与同志们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为个人的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与陈毅同志谈话时，说到刘邦和项羽，明确指出：项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失败了，落得个乌江自刎。1962年“七千人大会”

上，批评曾希圣的“霸王作风”，也曾经很严厉地说：“霸王是要别姬的！”可是他自己晚年也犯了“家长制”的错误，给党带来十年浩劫。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

马克思晚年说：“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万物无时不在变动，没有终极真理。马克思认为，一切真理，只有在运动中、辩论中才有可能求得。绝对的服从，绝对的统一，就等于抛弃了民主，也就等于脱离了人民群众，远离了真理，坠入封建专政的泥坑。那是要继续犯错误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登 照 函 来

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

近阅《炎黄春秋》第4期载《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一文，此文主要是依据《贺诚传》写出来的，文中有几处不准确，情况如下。

一、第26页左栏第14行：“1972年6月28日，一封来自山西太原……”，首先，这封信是贺诚在北京写后发出的，不是寄自太原，这在原信中有注明；其次，贺诚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72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批示的时间是6月28日；三是，引用的毛主席批语比原文少了一个字，原文是“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引文少了一个“给”字。

二、第27页左栏第2段对毛泽东主席1975年5月17日对贺诚问题批示的所述情节，和实际情况不同。这次批示是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批的。

三、第30页右栏倒18行“金沙水拍、大渡桥横”一节中讲红军军医学校成立的问题时，作者写为“1932年11月20日，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所述的时间和地点均有误，应是1932年2月在于都成立。

四、第31页左栏关于王稼祥受伤问题。王稼祥是1933年4月27日在乐安县以东的古岗村召开全军青

年工作会议时，遭敌机轰炸腹部被弹片打伤的。

五、第31页右栏倒数第二段“红五军团团长说：慢慢生……”，这话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说的，少了一个“军”字，大不一样。

六、第32页右栏倒数第二段，贺诚自苏联回国的时间，不是1947年，应是1945年。

七、第32页右栏最后一段，“村村设医院、户户作病房、人人当看护”，这是1948年辽沈战役时，第四野战军卫生部领导人根据当时战场情况采取的应急措施，不是贺诚提出的，更不是战地救护的一个固定方针；第四野战军入关时从东北军区带走的医院，准确说是34所（后方医院21所、兵站医院13所），不是“仅后方医院就带走四十余所”。

八、第34页左栏：“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应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同页右栏第5行：“根据林彪的十号命令，贺诚被遣送到太原北郊土堂村”，不是林彪的十号命令，应为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即1969年10月17日林彪署名发布的《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袭击的紧急指示》。

高恩显

(编者注：《贺诚传》作者是冯彩章、李葆定同志，高恩显同志为撰写该书提供过材料。另，读者盛其明同志来电指出：该文关于“1986年”邓小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应是“1983年”。今后我们除加强时刊发文稿的编校外，希望作者撰文时对有关具体史实认真核查，力求准确无误。如该书系根据别人著作编写或引用别人著作材料较多，应予说明或注明出处。)

万里三到无为

朱先央

安徽省无为县 1978 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 是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县份之一。为什么无为县在当时能冲破重重阻力, 在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呢? 这主要应归功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从 1978 年 9 月到 1979 年 12 月, 在无为实行大包干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阶段, 万里先后三次亲临无为县视察, 他说: “我要把无为作为推行大包干的联系点。”他每次来, 都是重点调研生产责任制推行情况, 发现问题, 及时作出指示。对此, 笔者仅就当年亲身经历作一些追述。

引江济巢 借地度荒

万里同志第一次来无为, 是在 1978 年 9 月 23 日。那一年的夏秋之间, 无为县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旱, 他一到无为, 就申明: 我这次来无为有两个任务, 一是省委决定, 要在无为县凤凰颈长江岸边引江济巢。在全省调集大型灌溉机械 400 多台套在那里安装, 引江水抗大旱。他还查阅了县档案馆保存的无为县志, 了解无为历史上大旱年份的情景, 他冒着高温酷暑, 顶着烈日, 亲临凤凰颈长江岸边装机抗旱的现场, 看望慰问正在挖渠架线装机的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

第二个任务是, 为解决大旱之年民生问题, 省委决定, 借地给农民度荒。万里在县委招待所接见了正在参加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区、镇党委书记, 并作了指示。当县委汇报到今年旱情是一百九十多年以来未见的大旱时, 万里说: “今年大旱要保证不饿死一个人, 我看到你们的县志上记载, 历史上乾隆五十年从第一年秋旱到第三年春, 如遇到这样情况, 你们又怎么办? 现在要考虑到冬季的问题和明年春季的问题。为了战胜旱灾, 省委决定借地度荒, 搞好秋种, 灾区每人借地

三分, 让社员种上午季, 谁种谁收, 以解决明年午后秋前的口粮”。

省委借地度荒的措施, 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更激发了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积极性, 第二年午收后, 农民顺利度过了春荒和夏荒。午季登场时, 农民没有刮饭让锅, 而是就汤下面, 顺手在借来的地里就种了下茬作物。这样, 包产到组, 包产到户的责任制, 在全县迅速推开。

通过生产责任制的实践, 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78 年夏秋虽然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旱, 全县粮、棉、油总产仍接近正常年景, 年终收益分配统计, 未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地方与已实行的地方, 产量对比的结论是: 队不如组, 组不如户。联产承包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不要硬纠 让他们去试嘛!

1979 年春, 正当无为全县生产责任制发展势不可挡, 生产热火朝天的时候, 社会上部分人关于联产承包的议论也是沸沸扬扬。有的说, 这么做违背了中央政策, 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有的基层干部, 一面积极推行生产责任制, 一面却又心有余悸, 担心是否会再犯“右倾”错误; 周边的县舆论更大, 说无为县是资本主义泛滥了。要“防汛”, 防无为资本主义泛滥的“汛”。

一时间, 无为县委、县革委负责同志面临的压力很大。农业生产责任制, 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搞下去? 县委曾多次开会讨论。面对群众对生产责任制的热情, 结合推行责任制一年来农村的实际变化, 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 认为, 联产责任制总的是符合省委“六条”的, 虽有些地方过了头, 出现了包产到户, 也不可怕, 过了头纠正就是了。面对外界的压力, 县

委提出,稳定生产队,完善作业组,纠正单干户,并形成了(79)35号文件,对稳定生产队,完善作业组,纠正单干户,提出实施上述方案的具体措施。之后从县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组成纠正单干户工作队,到各区、社帮助纠正单干户。

正当此紧要关头,1979年5月29日至30日,万里第二次来无为检查工作,当听过县委负责人汇报后,他指出:包产到组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不奇怪,矛盾越多越增产。关键是“包产”二字,

过去只有一个矛盾,就是肚子吃不饱。现在积极性相当高,生产计划,干什么事,人人负责,个个都知道,这不更好吗!有人说生产队长没权了,如果是瞎指挥权没有了,那倒是好事。不管怎么样,我要的是粮食。增产没问题,征购任务没问题,就是中间环节(指公共积累)要做工作。在生产责任制问题上,有人怕犯错误,就不怕不增产。有的社员群众怕政策变,要向他们讲清楚,将来变,也不能变到原来的大呼隆生产。这要看群众的态度,看社员欢迎不欢迎。听说你们组织了纠正单干户工作队,下去硬性纠正,不要这样搞了,群众已经这样试了,就让他们去试嘛!到下半年秋收时再说,看看到底是否增产,出点问题也不要怕。

根据万里同志的指示,县委立即撤回了纠正单干户工作队。一时间,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在全县范围内不推自广,形成燎原之势,全县13个区、镇,72个公社,645个大队,9000多个生产队,90%以上都实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秋季获得了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首次突破10亿斤大关。秋粮入库时,农民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交征购,卖余粮,全县当年完成征购加超购达3亿多斤,破历史最高纪录。有些粮站库容不够,就搭盖简易露天堆收购。粮食大丰收,让农民彻底告别了饥饿。推行责任制前,农民要



1977年底万里在安徽下基层视察的座谈会上

向机关干部的亲戚要粮票,买粮充饥。现在是机关干部向农民亲戚要粮食,补充粮票不足。

要明确宣布不变 不能摇摆不定

1979年12月14日,万里同志第三次来到无为检查工作,听过县委汇报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后,万里说,条件相等,搞不搞责任制大不一样,你们9个粮产区搞了包产责任制,结果个个都大增产,1个区坚持以队集体生产,结果是平产,就说明这个问题。你们刚才汇报的六峰大队两块田只隔一条小田埂,条件一样,一个搞了责任制,亩产1000斤,一个未搞责任制,亩产500斤。多1斤与自己有份,少1斤也与自己有份,跟他们切身利益相联系,就能调动积极性,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个核心问题。搞生产责任制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肥西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思想不解放不行啦!过去对一大二公、集体优越性的东西在头脑里灌得太多了。条件具备,生产条件好,领导班子强,集体是能发挥优越性的,条件不具备是不行的。现在你们这个形式是合适的,继续干下去,至少干它3年,如果条件不变,再加2年,干它5年,如条件再不改变,再干它几年,叫大家放心。各种生产责任制都可以搞,但要保证

增产,要国家增,社员增,凡是这样的都是好办法。

当县委负责同志汇报到个别地方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摇摇摆摆、举棋不定时,万里说,要明确宣布不变,不能摇摆不定,有的县就是吃了这个亏。当谈到有些地方包产到户时,万里说,包产到户,也不要回避,三中全会前,我就给中央挂了号,最后秋季大增产。没有群众自觉自愿,如要硬纠,就要减产。你们先提纠正单干户,然后提坚决纠正单干户,最后提如不纠正就要严肃处理。你们不要这样提,总的要抓住三条:一是增产多,二是贡献大,三是群众生活改善。有这三条,不管什么形式,县委要明确宣布不变。今年不变,三两年也不要变。毛主席讲,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上要时刻注意的问题。粮食问题,一是收,你们一定要收购,不要因为粮食多了,不能因仓容不够就不收。二是调出去,我回去就落实,就全国来讲,粮食不是多,而是少。仓容不足,准备明年给你们盖,你们按5000万斤仓容写报告报省。

大包干带来大发展

“要吃米、找万里”,这是丰收后,全县农民的心声。通过1978年、1979年推行联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真正是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

过去大呼隆最严重而后又最早搞起大包干的三溪公社的群众说,过去收多收少是大家的,现在收多收少是自家的。过去社员出工是一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四遍哨子才慢慢跟后逛。现在是两个组比着干,三个组赛着干,社员互相催着干,谁也不甘落后。过去是安排生产靠队长,下地干活等队长,遇到困难找队长,牲口下田喊队长,收不到粮食怨队长。现在是50多岁挑粪挑,60多岁扶犁梢,70多岁的把心操,七八岁小孩也能看青苗。现在农民有事就抓紧干,无事就休闲玩,有的地方休闲时还唱起了倒七戏(庐剧),一面娱乐,一面庆丰收。三汉河公社群众说得好,现在真是多做多少事,多看多少戏,多收多少稻,多睡多少觉。整个农村经济活跃,集市贸易繁荣,干群情绪高涨,关系融洽,从而大大促进

了生产的发展。全县过去历来后进的地方,如赵坝、三汉河、板桥、雍南、三溪等地方,一年巨变,增产都在300万斤以上。72个公社中,除有3个坚持以队生产减产外,其余个个增产,产量超历史纪录的有32个。645个大队中,增产的有603个,超历史纪录的有264个。

回顾农业生产责任制给无为县带来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振奋,成功确实来之不易。要知道当时贯彻执行省委“六条”的阻力是很大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

从1978年9月至1979年12月,在无为县推行生产责任制的起步和关键时刻,万里先后三次亲临无为县视察,每次都对县委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县委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发现县委组织纠正单干户工作队下去纠正单干户时,万里及时指出,不要这样纠了,让群众自己去试嘛!省委“六条”也是可以突破的;当发现有些地方摇摆不定时,万里指出,要明确宣布不变,不能摇摆不定。这对当时联产承包责任的巩固发展直至成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敬告作者

一、投寄我社的稿件,三个月内未接到拟刊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二、不刊用的稿件,凡打印文本和手写短稿,不予退稿;手写长稿,如作者要求,可退稿,请在投稿时付足退稿邮费。

三、向我社投寄稿件时,不要寄拟配发的照片,待我刊决定刊用后再与作者联系。

四、拟向我社投寄两三万字以上的长文和长篇书稿,请先与我们联系,经同意后再寄,以免丢失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五、向我社投稿的作者,请在稿件上注明详细联系方式及作者本人的身份证号码。

《炎黄春秋》编辑室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

李昌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的变化,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高度相关。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走近尾声的时候,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迁?每一次的变迁对政治、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制度最终做什么样的定位呢?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共同纲领》实际上为土地国有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949年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致通过《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实际上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确定了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

1949年前后在全国进行的土改(耕者有其田)还没有完全结束,1951年9月,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同年12月15日亲自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的通知,从此拉开了农村合作化的序幕。为什么要合作化呢?合作化也是《共同纲领》决定的,《共同纲领》第三十八条,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主要是在将农业地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同时,通过对农产品的控制和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控制,实现对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与《共同纲领》第31条之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一致的。

我们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不难发现,因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化,对当时“一穷二白”且面临帝国主义威胁和封锁的新中国而言,农村土地地租(实物税)和对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剪刀差”,必然成为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和手段。在我看来,《共同纲领》决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和“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实现方式,实际上为国家将1947年在解放区“革命土改”推行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提供了法律上的伏笔。

二、土改,不是给农民完全的土地产权,实际上是建立“国家所有,农民‘平均’占有土地农用工”的土地制度。

太多的学者一直认为,土改是给了农民完全的土地私有权,这是值得商榷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国际环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同时要养活400万军队、保障城乡的有效供给、维持政府的运转和保证国家基础性工业项目上马,唯一可以靠得住的、控制得了的物质基础就是农业地租。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中国必须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实施快速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对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的土改必须完成两个根本任务:一是建立土地的国家属性,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雇农,耕者有其(份额)田。但是,分得的田都是新中国的田,不再是旧中国的带有封建性质的私人所有的田了。确立了土地的国家属性,就确立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在重分土地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建立起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同时通过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获取比旧社会更多的土地地租。所以,土地是中国新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根本。

对于上述的判断,我们可以从《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找到依据: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最初的“和平土改”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实际的效果难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1949年至1950年党的部级以上干部参阅的《内部参考》,每周都有新华社记者反映农会和区公所被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控制,或破坏土改,或威胁贫农雇农,或贫雇农将政府分配的土地还给地主,或贫雇农对土改和新政府悲观失望的报道。于是在1951年,坚持和平土改的主张让位于“急进土改”的主张,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号召下,“急进土改”一改“和平土改”时期“反动势力顽强抵抗”和“贫雇农可怜巴巴”的被动局面,激烈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一方面,土地彻底重分,消除了“老业”“祖业”思想,确立了共产党政府给农民土地的事实;另一方面,贫雇农斗倒了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和坏分子,将混进农会组织和基层政府中的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坏分子及其代理人彻底清理,贫下中农完全掌握农村政权和政治主导权。“急进土改”实际上是调动多数贫困农

民“耕者有其田”和“翻身做主人”的“积极性”,帮助共产党“改造”和“清除”了不太听话的、甚至是对抗的少数“地、富、反、坏”分子,确立土地国有属性,使得经济上建立了以地租为基础的财政和以统购统销农产品为物质保证的经济秩序,政治上建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会组织和以农会组织为政治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土改为共产党建立起了“地根”经济和“地根”政治。

假如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的“急进土改”,如果用台湾出钱赎买地主土地的办法土改,土地就不仅不能为国家快速工业化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反而还会给新而脆弱的政权背上巨大的包袱,更难以建立起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也不能建立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对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大陆的土改和台湾的土改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台湾的土改实际上是承认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土地私人占用的重新调整;大陆的土改是在没收所有土地,否定既往的一切土地私有产权,强制确立土地国家所有属性的基础上,平均分配给耕者使用,所有的耕者实际上是国家的长期佃户。

在部级以上干部参阅的《内部参考》中,和平土改时期,每周都有1-2篇反映各地商人哄抬物价或联合起来压低农产品价格或普遍偷税漏税的报告,实物地租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作用,但对稳定市场、平衡财政和对工商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力不从心的。随着土改的深入,新政府有了“国有土地”稳定的地租收入和基层组织与政权。1950—1952年,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8.5%,如果加上地方附加和各种爱国捐款,农民对政府的实际贡献超过土地收益的40%。紧随着,1953年又在实物地租的基础上建立起“统购统销”制度,成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武器。国家税收大幅增长,1953年农业税收入27.11亿元,比1950年的19亿元增长了50%,但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2.2%。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在实物地租的基础上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控制工商业原料的来源和销售市场,工商业资本不接受改造也不行了,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和工商税收也大幅上升。实际上,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是建立在“土地国有”

的基础上的。土改——土地国有化，实际上是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起点。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土地集体所有几乎没有人以“土地私人所有”为理据进行过反抗，这实际上证明在多数耕者的心目中默认“土地是国家给的，国家说咋的就咋的”了。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依然认为，“土地既不是个人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国家所有”，应该说是历史原因的。

建国后土改的“土地证”与现在发给农民的“土地承包证”十分相似，只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所有，耕者使用”的一种确认。《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不能休耕，不能撂荒，农民没有将农地用于工商业的权利。这就说明，土改时发给农民的“土地证”实际上是产权残缺的“产权证”，没有产生过今天“房产证”这样的物权效能，仅仅是有限的产权——农地农用永佃权，甚至，这种残缺的产权也只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

三、合作化以来，农村土地建立集体所有制是虚，巩固国家所有制是实，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

土改随后而来的合作化，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进一步论述：“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农业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

合作化后，以统购统销为基础的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国民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整体上进一步朝着“一大二公”的方向发展。

随后，公社既是基本经济单元，又是最基层的政府。按劳分配和按照人口分配是公社的主要分配形式，土地产权在农产品分配中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并且可以“一平二调”。

如1953年4月经中央批转的华北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其中规定：社员土地入社，统一使用，社员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比例的收获量。但1954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逐渐社会主义化问题复东北局电》，主张用降低至取消土地报酬的方式，而不是购买的方式实现“土地公有”，否定了沈阳市委打算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低价收买土地的办法。195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合并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正式取消了土地报酬。其中规定：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报酬。和50年代初期比较，土地实际上由“国家所有，农户永佃”变成了“国家所有，公社（政府）经营”；生产由农民自主生产转变为公社有计划生产；农产品由实物地租外的政府定购转变为除口粮以外的统销；生产资料由分户购买转变为计划调拨和交换——统购。

实际上，“土地集体所有”，只是有权“在国家



《中国土地法大纲》被抄在墙壁上



人民政府向农民颁发土地证，确定农民对土地房产的所有权。图为东北、华北区颁发的土地执照和土地房产所有证

圈定的土地上，由基层政府执行国家的生产计划和购销计划”，“集体”并没有“土地所有者”的任何权利。这类似地主和长工之间的关系，丝毫看不到“集体”作为一个产权者的任何权益存在。公社（政社合一）化后，农村土地制度分明是朝“公”的方向进一步了——“国家所有，公社计划经营”，实际上是国家剥夺了农民家庭在土改时期获得的不完全土地产权——农地农用权，“集体所有制”只是以“集体”的名义从农民个人的手上收回了土地权——便于执行经济计划和统购统销和对工商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我看来，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仅仅只是国家收回农民土地权益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1958年后的三年，全国出现了大面积灾荒，1962年9月，中央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公社制度的危害性有了统一的认识，于是改进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至今没有明白，官方文件承认的“三级（公社、大队、小队）所有”怎么就被视为“集体所有”呢？公社这个政社一体是“集体”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土地国家所有，社队（集体）联产承包”，实行的是“增产多交（地租），减产不少交（地租）”的“集体承包”+“统购统销”政策。这类类似于地主和雇农的关系。

“土地国家所有，社队（集体）联产承包+统购统销”，在当时主要有三大进步：一是对社队成员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多劳动、多增产就能多吃饭；二是有利于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促进生产

发展的同时，可以节约成本；三是可以挤出劳动力搞农业生产以外的副业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承包制，很快扭转了饥荒局面，农村有了一个小阳春。但“集体承包”的激励作用也是有限的，同时也无法消解“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集体承包”的能量释放已尽；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品越来越多的下乡，需要交换更多的农产品。公社制度既对国家工业化失去了“原始积累”的积极作用，甚至成为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交换的障碍，又对农民积极性的发挥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四、安徽小井庄的农村改革，是“社队（集体）联产承包”转向“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在“土地国家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的微观主体发生了改变。

文革后期，公社将农业地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绩效越来越低，指望公社化为工业品下乡提供广阔市场的预期也不能实现。《论十大关系》所期待的工农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局面落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党全国都在寻求新的突破。浙江、贵州、四川、安徽等地的农村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就一直有零星的家庭承包的苗头，但都被“文革”极左的运动打压了。1978年，安徽肥西小井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个别县领导的支持下有了一定的规模，紧随其后的是

“小岗村”17个村民“冒死”也要“大包干”。但小井村的家庭承包没有像小岗村那样的幸运，受到了上面的批判和打压。小岗村没有受到打压，所以，小岗村成了“家庭联产承包的发源地”。

“家庭联产承包”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将过去的生产单元小队改为了家庭，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进一步“右倾”。“家庭联产承包”并没有改变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如：农业地租转化为国家工业积累没有变（比过去转移的更多了），土地的承包期、税费标准、流转方式、农产品的买卖交易方式等等依然是国家说了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穿了，它是真正的“土地国家所有，社队经营+农户承包”，但它进一步增强了对农民生产的激励。落后的小岗村的“落后”农民也能“交足国家的”，让当局认识到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对国家的好处；或者说是农民对国家工业化更大的贡献“买来”了“家庭承包”的自主权利。这时的土地制度——“国家所有，社队经营+农户承包”，与“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十分相似。

五、1977—1988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非农用权利集体所有，是一个特例，是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导力量的自然选择。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从土改以来，总的趋势是向国有化发展的，但1977年——1988年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时期的土地制度，主要的特征是农地农用权表现出“国家所有、家庭经营”趋势，而“基本农田”以外的土地非农用权却是“集体所有、社企经营”的。

在这十年当中，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发展占地，农民集体在保证完成国家粮食任务和公粮的前提下，基本上可以“自主决定”。一般是公社或乡镇政府“审批”，最多报县政府备案即可，不需要国家审批。这十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除农业生产水平直线上升外，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突飞猛进。1977—1988年，农村工业对工业的增长贡献，一直保持在

41%的水平，1992年，更是达到71.1%。

华西、南街、大邱庄等一大批“明星村”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苏南的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温州和广州等沿海地区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这十年的特殊土地政策，为中国经济突破高度计划模式的困局，形成乡镇企业半壁河山、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的新局面，也为“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

假如站在农民、农村的立场上评价建国以来的土地制度，毫无疑问1977—1988年间的土地制度是最好的土地制度。

在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土地也急剧减少，仅1985年，减少耕地2300多万亩，导致1985年后连续几年的粮食产量停滞不前，“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农地非农用的权利开始收归国家。土地制度的这个重大转变以1987年国家正式出台《土地管理法》为标志。1988年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的非农用权正式收归国有。土地非农用制度的变迁轨迹，又回归到了国有化的轨道。

1988年后，在强化土地非农用权国有化的同时，对农民原有的自留地、宅基地和农用地权利，也同时缩小了。如，宅基地和自留地过去由农民集体自主安排，88年后要集体申请政府土地部门批准；农田开挖鱼池过去集体可以决定，后由政府土地部门审批；农田水利工程附属地，过去都属于集体的，88年后都收归政府水利部门了；过去，承包费中的相当部分（约30%以上）是村社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的主要来源，后逐步被政府支配和占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是加强了，不是放下了，更加没有理由证明农村土地是村社农民集体所有。村社农民集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权益不是加强了，而是弱化了。

六、1997年的“二轮承包”，实际上是正式确立了“国家所有，农民永佃”的土地制度。宣告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消亡。

1978年后发源于安徽的农村改革，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推广的时候，不少地方自发改变为“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温铁军认为：“联产承包”是在保证农户按照集体计划进行生产的前提下，集体把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权让给农民。“大包干”是集体在对农户以承包的名义按照人口分田之后，集体退出了农业的直接生产。实际上，“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承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大包干”则是带有否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性质的改革，为后来的人民公社解体埋下了伏笔。虽然民间的改革称为“大包干”，但在中央连续几个一号文件中依然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双层经营体制”。不论文件怎么表述，实际发生的才是重要的。

1984年底，中央根据农民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做出了“大稳定，小调整，一包15年不变”的决定。贵州则根据自己的特点，做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包30年不变”的决定。1984年后，人民公社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而解体，乡村重新设立乡镇人民政府；生产大队改为了村民委员会（行政村），“队为基础”的生产小队，改为没有经济功能的村民小组。虽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解体了，中央规定了土地承包一定15年不变的基本政策，但是全国各地的农村以村民小组（少数地方以行政村）为单位，依然遵守承包初期“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约定，3-5年小调整，5-8年大调整。对于农民遵守约定的顽强，政府和学者不以为然。1997年，一次承包15年期满，由中央部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二轮承包”。这一次承包，规定一定30年不变，统一发放承包权证。由于1997年正是农民种地负担最重、粮价进入阶段性低谷、种地微利或亏本的特殊时期，对于这次全国统一的部署，基层没有认真执行。而贵州则在原来一直没有调整土地的基础上，继续30年不变，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所有、农民永佃”制度。

在1997年后的几年内，由于土地农用的收益急剧下降，农民负担不减反增，村民集体组织的经济基础遭受严重破坏，村民自治功能名存实亡，农村土地被廉价征用非常严重。“开发区建设和经营城市”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不少地方出现了“零低价”招商，一方面是投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多次启动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是农民失地补偿不到位，造成数千万人失地又失业。

于是，中央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再次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1998年12月27日由朱镕基总理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200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在家庭承包制度执行20多年后，《土地承包法》正式生效，家庭承包正式合法化。《土地承包法》对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原有的自治权利，如承包的期限、承包费的多少，土地的调整与整治等等权利，全部收归国家了。《宪法》规定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正式成了一句空话。随着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宣布取消农业税及其附加后，村民委员会完全失去经济基础，决定了双层经营体制的灭亡，这实际上是消灭了“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巩固了土地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将三权分离：国家的所有权，集体的永佃权，农户的有偿耕种权变成了“土地国家所有，农民永佃”，集体（村社组织就像昔日的人民公社一样，失去了配置资源和收取地租的权利）面临解体。

七、50多年来土地制度演变的逻辑

国家利益至上，工业化至上，城市化至上是50多年土地制度演变的基本原则。国家权力一直是主导土地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为了保证国家利益至上、工业化至上、城市化至上，土地始终是政府手中的工具和筹码。当“国家”需要“以粮为纲”时，土地就无条件用作粮食生产；当国家需要占有更多的土地地租时，农民和农民集体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当“工业化”需要更多的积累时，农民和农民集体就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当城市化和现代化需要占用更多的土地时，政府便廉价占用农民的土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由生产者自主配置一直没有充分实现；土地作为农民

的产权,从来没有让农民自主选择实现形式和经营方式。

纵观 50 多年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土地的农业地租(基础地租)基本上转化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了;土地的级差地租基本上转化为地方政府城市化的资本积累了,但很大部分又同时流入了官商的口袋。

八、我的主张和依据

对于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安排,我的主张是:农村土地制度后退到 1980 年——“村民集体拥有土地农用的全部权利,自留地、宅基地、荒地和四旁地等土地非农用的全部权利和一定比例的农地依法转为非农用地的部分权利”。在此前提下,由农民集体成员依法“自主选择集体土地产权的经营形式和产权经营收益的分配方式”。

上个世纪 90 年代,是中国经济全面高速增长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产生活困顿,社会冲突突出的时代。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全面萎缩。农民权利萎缩是与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虚化同步的。

1988 年,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企业,要受《基本农田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约束了,农民在 1977——1988 年所享受的不完全的农地农用权利和完全的土地非农用权利被剥夺了,农民将自己的稻田挖成鱼池的权利都没有了,用自己的土地办加工厂的权利就更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演化成完全的国有制了。这实质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权利。

1988 年后,由于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被“和平演变”为国家所有制,建立在农村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失去产权保障和经济基础,逐步散失功能或名存实亡。随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降低,在经济层面,农民除在市场经济中蒙受合法资本的剥夺外,还毫无还手之力地受到了权贵资本和黑恶势力的剥夺和欺诈;在政治层面,虽然推行了村民自治,但绝大多数自治组织失去了产权和财政基础,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上沦为“乞丐”,不得不成为基层政府的附庸和帮助政府征

用农民土地——剥夺农民土地权利的中介,农民对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博弈能力,农民在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了。

80 年代是一个扩大农民经济权利(核心是土地权利——集体分享所有权,家庭分享农地承包经营权)和政治权利(核心是公社解体,建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时代。80 年代的农村改革,经济上,“民有向前进,国有向后退”;政治上,“民权向前进,官权向后退”。而 90 年代的农村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上“国有向前进,民有向后退”;政治上,“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这就是 80 年代的农村繁荣和谐、90 年代农村凋敝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公社制度走投无路的时候,小岗村带给了我们柳暗花明;进入 90 年代,当小岗村山穷水尽的时候,苏南、温州等地的农村又给我们带来了柳暗花明;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苏南、温州模式,在带来 GDP 巨大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中国农民福利的同步增长;在再一次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2005 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土地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呢?

我的主张是,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优先给村民集体占用级差地租的权利,要依靠构建新的二元体制,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什么叫村民集体资本主义呢?我的定义是:将村民的土地和劳动转化为村发展的资本,而不是被外来资本资本化,村民成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剩余价值的主人。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就是要让村民集体的民主自治组织或经济合作组织优先占有土地非农用产权收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要为优先实现村民民主自治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的土地产权提供服务。

(作者因向总理上书直言三农困境被《南方周末》评为 2000 年年度人物)

(责任编辑 吴 思)

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

高 奇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主席对不少老干部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的来信，做出了批示，周恩来总理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解放。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于1972年8月成立了专门机构，配调人员集中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开始是在干部组下设一审干组，1975年6月扩大机构、充实人员，改为直属部的调查组（即局）。此事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所经办的为曹荻秋同志平反的曲折过程，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上海市委定曹荻秋为“叛徒”，我提出应进行复查

曹荻秋原任上海市委书记，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长期做党的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3年9月上海市委向中央写出报告将其定为“叛徒”。

在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中，涉及到不少人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由于“文革”中对过去有关的许多政策规定都被批判为“叛徒哲学”，而中央又没有发布新的统一的具体政策界限，所以办理起来难度很大。不少省市都派人到中组部汇报情况，征求意见。

1975年10月的一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派市委组织组组长王日初到中组部汇报，征求对几位受审查的市领导干部的结论定性意见。我当时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主管这方面工作，部里决定由我同王日初交谈。当时部里有个说法，即上海的问题非常敏感，有些事往往捅到上边（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弄不好会惹出问题，因此不能轻易表示意见，事不得已时只能讲讲个人的看法。

接受任务后，我仔细翻看了上海报来的关于原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韩哲一的审查结论材料，发现报告中提到韩哲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不提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其时，正好看到上面转来的曹荻秋写给毛主席的信，详细阐述了他1932年在上海被捕的情况，强烈反对定他为叛徒。根据这一情况，我在同王日初谈话时提出，既然韩哲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市委就应明确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曹荻秋最近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不同意定他为叛徒，建议上海市委对此案进行复查。王日初问我，主席怎么批的。我如实告诉他没有具体批示。当时王对我讲的意见没有表示态度，只说回去后向市委汇报、研究。但上海很快将我的谈话的内容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中组部向中央写报告否定上海市委的审查结论

对于上海市委关于曹荻秋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我同组内的同志对有关材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并在调查组负责人会上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1932年曹在上海被捕后，一没有向敌人承认是共产党员，二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三没有供出同志和党的组织，不当定为叛徒。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本来不是问题的两件事认为是属于犯有错误。

一次部核心组组长（即部长）郭玉峰主持召开核心组会议，专题研究曹荻秋的问题。会上，我就曹荻秋的被捕情况和上海的查证材料作了详细汇报，具体讲了不同意定为叛徒的理由和根据。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我汇报的意见，决定按此向中央写出报告。会后我主持起草了中组部关于曹荻秋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的报告，经郭玉峰审核签署后报送了中央。



曹荻秋

张春桥蓄意将曹荻秋打成叛徒，追查我同上海来人的谈话

中组部的报告上送后，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表示同意，批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时过不久，转来了张春桥在报告上的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么？”显然，他不同意中组部的意见，而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

1975年末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曹荻秋叛徒一事成为一个问题在部内有了争议。1976年3月曹荻秋逝世，家属据理要求及早作出结论。1976年4月5日上午，部核心组开会，要我参加，郭玉峰说：曹荻秋的事，登奎批拟可同意中组部邀上海来人商量，再向主席、中央报告；张春桥批的是，可以商量，但不同意中组部的结论。于是我又重申了原来的意见，同时强调这牵涉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有类似问题的其他人结论如何定性问题，应严肃对待。会上有人一改原来的态度，发言说曹的问题属于可定（叛徒）可不定的。郭玉峰则说：这事要定，下边向上边的报告上边不同意是常有的；可考虑作特殊问题处理，不要牵扯面大了。意思是打算按张春桥的批示办理。

4月7日上午，部核心组主管调查工作的副组长听取上海派来的市委专案办负责人的汇报，说市委这次研究倾向定曹荻秋为叛徒。但此人回去又来电告知，这只是王少庸的个人意见，经市委研究，如何定还是“吃不准”。

4月23日深夜12时郭玉峰给我打电话，说：纪登奎就曹荻秋结论问题同张春桥谈了，说上海不拿意见组织部不大好办。张春桥说，这事也难也不难，你要查一下去年组织部的人同上海来人的谈话，是从韩哲一问题谈起的，查一下就清楚了。郭问我，当时是谁同上海来人谈的，都谈了些什么？我当即告郭，是我同王日初谈的，并简要讲了谈话的内容。

4月24日下午，我同上海市委组织组取得联系，请王日初用保密电话将他笔记本上记录的我同他谈话的内容逐字逐句读给我听，我作记录后又作了复述，经核对无误后，将记录送给了郭玉峰。4月26日上午，郭玉峰找到他的办公室，说：关于曹荻秋的事已和张春桥、纪登奎谈过了，电话稿（即我同王日初的谈话记录）也送了。张春桥说，是否由纪登奎给马老（上海的马天水）打个电话。事后纪说，这个电话如何打？先放一放，等（五一）节后再说吧。对我的追查也就拖了下来。

部领导人丧失原则，同意定曹荻秋为“叛徒”

1976年6月22日下午，郭玉峰和部核心组三位副组长集体找调查组屈清华、赵振东和我三个负责人谈话。郭说：（最近）张春桥批示，曹荻秋的问题不是可以作结论了吗？这个事原来打算写报告倾向同意上海市委意见，但市委研究说还是“吃不准”；让（我们）就近向上请示。向纪登奎反映后，纪问了张春桥，张说查下组织部就清楚了。谈话记录稿送上后纪说过了“五一”再说。以后曹荻秋妻子来京，由核心组一位副组长接谈。动员她按上海市委的安排，先火化。关于曹的结论报告，打算将上海1973年定为叛徒的意见写上，再将1975年他们“拿不准”的意见也写上，然后说我们同意他们1973年的意见，这个案子也就结了。我和调查组另两位负责人都表示，审查的情况没有变化，我们仍是原来的意见。核心组的一位副组长说：从现在情况看，只能这样办，把原核心组的报告后边改一下就行了。

事至于此，调查组已无可奈何，只好组织服从，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按部核心组定的调子改写了报告，送到了部里。

粉碎“四人帮”后重写报告，郭玉峰作了检讨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12月的一天，郭玉峰对我说，曹荻秋的问题要再研究一下，(报告)登奎退回来了。即76年6月上送的同意定曹为叛徒的报告纪登奎压下没有批出去，压在了那里，这次退回了。

1977年1月初，郭玉峰告我：派到上海的工作组赵振东来信，说曹荻秋的家属给先念写了报告，华国锋批给了苏振华。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要赵振东根据曹的情况按照党的政策办。你去上海帮助研究一下，不要参加调查，由赵振东工作组对上海市委负责人写报告，报告可以提到中央组织部曾经提过什么意见，张春桥如何不同意。1月11日我飞赴上海，同赵振东等就曹荻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除不应定曹为叛徒外，还应查一下张、王、姚、马等在迫害曹的问题上都搞了些什么活动，查清曹的病因，研究写出结论，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市委报告。

1月16日上午，郭玉峰召开会议研究上海工作组写的报告稿。郭说：写的太长，过程不必写的这么细，可以工作组调查小组的名义写个报告，然后由赵振东附上一个简要报告，说明进行了调查，本可不定叛徒，但“四人帮”插手，硬要定；同时说明曹的死因和善后工作意见，(曹的)问题也要摘上。

1977年11月16日部核心组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郭玉峰作检查，他在讲到曹荻秋问题时检讨说：对曹的问题，调查组和部里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不应定为叛徒，但张春桥却硬要定。最后我们写了同意上海市委73年定曹为叛徒的报告，没有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压力。

为曹荻秋平反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连续召开整风会，广泛发动群众，听取意见。在1978年1月2日上午的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曹荻秋问题的办理过程，说张春桥搞阴谋硬要把曹荻秋打成叛徒，郭玉峰不坚持原则，改变原报告不

定叛徒的结论，改写向中央的报告，同意定为叛徒。胡耀邦听了我的发言后说，如高奇刚才所说，郭玉峰有什么原则？做干部工作，不坚持党性，不坚持原则，危险得很！坚持原则，无非是不当官嘛！拿原则做交易，是违反党纪国法。要抓几个“四人帮”颠倒是非，陷害人，某些同志拿原则做交易的典型，写出详细经过，有的在内部通报，有的在报上发表。曹荻秋的问题作一个案例，看张春桥耍了多少阴谋要把曹打成叛徒。耀邦并说：许多时候，往往下边的同志实事求是或基本实事求是，上边往往违反实事求是，联系到整风，还是要抓上边(的问题)。

耀邦讲话后，原部核心组的一位成员发言说：郭玉峰是围着“四人帮”转的，曹荻秋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调查组不定叛徒的意见，但郭玉峰和其他领导找核心组成员谈话，说曹是边缘人物，张春桥不同意组织部意见，看来可以定。原核心组一位原副组长发言说：事情本身我有错误，不坚持原则，丢掉了党性。第一次(报告)意见是一致的，张春桥批了以后，当时有争论，有的同志有意见，郭玉峰说老这么坚持要犯错误，把我和另两位副组长找去，引导着要定叛徒。我表示同意，还做别人的工作。

在1978年2月3日的整风会上，胡耀邦又谈到曹荻秋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开了18次了，发言的有37位，(除写出)总的材料外，要搞些专题向中央报一下，如曹荻秋的问题。要把曹打成叛徒是张春桥的主意，其中自然涉及郭玉峰的责任。调查组要写一下事实经过。

2月11日，胡耀邦要我参加，听取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振东关于上海干部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曹荻秋的问题时，耀邦明确表态说：曹荻秋不仅不是叛徒，而且表现是好的，是张春桥一手陷害的，郭玉峰丧失了原则。曹荻秋应当完全平反，这件事由我们两家来做，要隆重搞一下，恢复名誉。

此后不久，曹荻秋得到彻底平反。经过长达数年的曲折斗争，终于落实了党的政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曹荻秋同志以公道。但斯人已含冤逝去，只能告慰其在天之灵了。(责任编辑 吴思)

(作者是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副局长、国家审计署办公厅原主任兼研究室主任)

社会选择出来的干部战斗力强

冯东书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消灭陕北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挂名）开始他以为陕北红军人不多，长征转战八九个省（当时现在的四川的西部是西康省），是缺弹缺粮的疲惫之师，战斗力不会太强了。可是一接火，他就打了大败仗，他想不通。他不想再打了，想抗日，收回他的东北失地，就通过秘密渠道偷偷找来一个老共产党员刘鼎。1936年3月，张学良见到刘鼎，一开始就谈到红军的长征，他说：“在长征那样苦的条件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扩充队伍，即使打败了也溃散不了，真是不可思议。”他又说：“国民党的军队打仗靠的武器装备好，弹药给养充足，人多势众，打胜了好办，打败了就溃散。红军撤得开收得拢。我的部队一撤开就收不拢，这是为什么？”刘鼎就向他介绍红军的特点，它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从那以后，他就认定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他向蒋介石讲过这个观点。蒋介石当然听不下去。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刚取得全国政权时，我还是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没有参加过打仗，不知军队之事。但是我1950年2月到新华社工作以后，看到那个革命干部队伍，不能说人人优秀，但是在严格要求自己，互相关心，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困难工作带头抢着做，工作认真负责，工作起来不讲价钱，廉洁奉公，纪律严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等方面是普遍现象。这使我们这样的小青年参加进来，真是进了一所好学校。

那时穷，大家都为公家节省每一点钱。旧信封翻过来还要用，用过的稿纸翻过来还要用来打草稿。日常生活中看见需要做的事会自动去做，看见不对的事，也会主动出面干预。

共产党因为有这么一支干部队伍，战斗力自然强，也正是这样，它才把腐败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打到了台湾。

这支队伍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社会斗争的选择形成的。国民党开始时也是革命的，所以和共产党合作打

过军阀。后来它在全国执政以后，权力的腐蚀凸显出来，国权私有，国权私用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腐败了。人们当然不满，它就必然地越来越走向压制、独裁，专制起来。于是对外侵略软弱无力，对内到处欺压百姓，杀坚持革命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好多人只是因为对外要求抗日，对内要求民主，反对腐败，就被当共产党抓起来杀了。这在全国群众中，特别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极大的反感。而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这又在全国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反差，于是，人们投向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在穷山沟沟里，没有全国政权，穷得很，投奔那里去干革命，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只发一点点津贴，甚至有时连津贴都发不出，只管粗茶淡饭。衣服也只发粗布的，有时还按时发不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共产党员是提着自己的脑袋，自己挣了钱干革命的。国民党还到处设卡，派特务抓、杀投奔共产党的人。这样就把人自然地分开了，想升官发财的人，都投奔到蒋介石的国民党那里去，这就使他们那支队伍越来越没有了战斗力。而投奔到共产党这边来的就是自愿为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利益，为民主建国吃苦、牺牲自己的人，其中有些人还是国民党里的高级干部子女。他们都有为此理想不怕吃苦、不怕杀头、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社会选择是一种天然的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共产党里拥有了一支优秀的、人们拥护热爱的干部队伍，就使共产党有了战无不胜的力量。共产党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就义时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很有代表性。

当然，有这么一个社会选择的基础，进了革命队伍，再加上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思想教育也就起了作用，使他们进一步有了革命人生观，学会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去观察问题，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这就使他们更坚强，更有科学头脑，也就更有战斗力。（责任编辑 吴 思）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袁剑平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

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

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了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图为1977年高校招生时北京市的一个考场

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

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

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本文的相关材料由薛开震、范天成、张玉林等同志提供）（责任编辑 吴思）

胡宗南的未遂起义

朱汉生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在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的形势下，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1949年5月19日解放军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战线，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宝鸡。7月份宝鸡被克，他又逃往汉中，以秦岭和大巴山为屏障，和解放军对峙。手中只剩下三个兵团，苦苦支撑，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来自己的亲信幕僚、高级参谋朱亚英面商对策。

我的父亲朱亚英原系西北军出身，因为年轻英俊，富有才华而被冯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全中国仅有三人在此校毕业：即他的师兄著名军事学家、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他的师弟蒋纬国和朱亚英本人），回国后他在杨虎城将军手下任少将高参、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参谋长等职。他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将校班）毕业后，又被胡宗南看中，调到所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和副官处处长。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广罗人材，备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便将来成就其在军界的一统大业。父亲虽然才华出众，多谋善断，但因系西北军出身，不是蒋、胡的黄埔系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军权和实权，只能作为亲信幕僚使用。但胡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是礼贤下士，待若上宾。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市长用一辆，另一辆就给我父亲用；当时我母亲因肾结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国人送给他的一箱新药盘尼西林（即刚刚临床使用的青霉素）转

赠给父亲……这种手法有效地笼络了不少人才。

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树倒猢狲散，每个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后路。我父亲通过自己的同乡、小学同学郭秉毅（周恩来派往四川军阀刘湘处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党员），早已与中共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起义，并把妻儿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见，我父亲猜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个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则是自己的投诚起义行动有所暴露。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胡宗南。

使我父亲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来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亲虽然不知道这位长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优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图报，在此艰难困顿之际，当然要为胡先生尽心谋划。胡宗南直言对我父亲说，现共党大军压境，其锋锐利，士气正盛，敌我对比，形势极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顾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诉我父亲，前几天彭德怀释放了张新旅长，让他带来一封亲笔信，建议胡宗南起义投诚，共方保证以礼相待。

胡宗南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胡表示蒋待自己可谓恩重如山，所以忘恩负义背叛校长的事他做不来。可是抵抗下去，孤掌难鸣，也难有作为。胡其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父亲见胡宗南确如热锅上的蚂蚁，是真心实意要听取他的意见，就壮着胆子为胡宗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大意如下：军事形势，不言自明，固守汉中历来乃兵家大忌。它虽扼守陕南和西北及西南腹地，然而地势平坦低下，进不可攻，退不可守；而共军挟胜利之师，其势正旺，锐不可挡。当初胡先生率几十万大军，进攻陕北，尚且屡遭败绩，损失惨重，自忖以今日之师，能否据守汉中？从政治形势看，蒋先生在徐蚌会战之后，始终难以扭转被动局面，

现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撑。蒋先生自己退居台湾，却要先生力撑残局，固守这半壁江山，实非人力所及……胡宗南表示，形势的确如此，但他仍然觉得不能背叛校长。父亲回忆胡曾亲口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据父亲的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不走起义这一步，而是他觉得背叛校长的事情他无法做。

我父亲赶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言，说张新带书，乃千载难逢之机。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机。我父亲为胡宗南分析说，台湾现由陈诚主事，胡如战败，残兵败将即使退到台湾，又有何颜面去见蒋先生？且胡的处境一定不会好。父亲建议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怀将军建议，起义投诚！以目前手中尚有三个兵团，兵不血刃，献上汉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灵涂炭。父亲对胡宗南说，这样共党必将厚待先生，今后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泽故旧，也都绝处逢生，此乃一举数得之策。胡宗南犹豫再三，在室内踟蹰良久。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并委托我父亲全权办理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因为我父亲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产党高层包括毛泽东都有过接触。胡宗南嘱咐父亲此事极端机密，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口风。父亲见此，极为喜悦，立即设想如何与郭秉毅联系，汇报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蒋介石的密电：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临行前对父亲叮嘱说商谈之事等他回来再议。

二日后，胡宗南返回汉中。一下飞机，立即下令逮捕张新，交军统监禁。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虽然他明知此举将毁掉他的几十万大军，但仍然决心“士为知己者死”，绝不能对不起蒋校长。

我父亲见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遂借口公务，出差武汉，在机场却转乘了飞机去成都。后来参加了裴昌会部的起义，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汉中后，逃往成都，转三亚，最后来到西昌。

蒋介石见胡宗南全军覆没，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与西昌共存亡。

胡手下有三个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在成都起义；他的得力干将李文的第五兵团在冲向雅安的过程中，在

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下，不得不向解放军投诚，只有少数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直陈蒋介石：“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才默许派机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飞机逃往台湾，把剩下的六万人马丢给了解放军。

胡宗南飞到台湾桃园机场，根本无人理睬。只好灰溜溜地躲进他在花莲海滨的寓所，终日在家以练毛笔字，看书报消度时日。后来又遭监察院弹劾，还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了了之。晚景凄凉惨淡，在郁郁寡欢之中，于1962年死去，时年66岁。

胡宗南一生效忠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军的重压之下，也曾萌发过起义的念头。只是由于国民党的情治单位嗅觉灵敏，从张新被释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蒋介石的及时召见下，才阻止了这场未遂的“起义”。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亲两个人的心中，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底。

我的父亲朱亚英虽然起义了，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被错判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后因在劳改中翻译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著作立功，减刑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被释放，在邢台唐庄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他在晚年，对我叙说了这段往事，每每顿足抱怨：“竖子不可与谋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毁了我的后半生。”

我的父亲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这段往事，引以为终生憾事。我想：如果当年胡宗南听取了他的建言，也许他们两个人的晚景都不会如此凄惨。

张新的命运要好一些，他被军统监禁时，在一次混乱中逃脱，投向人民。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浦江县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

(责任编辑 吴思)

郭小川、水华的 倾力之作为何失败

郭晓惠

著名电影导演水华，一生从影 37 年，总共只拍了 7 部影片，其中却有 4 部获奖：《白毛女》、《林家铺子》、《革命家庭》、《伤逝》，这每一部影片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久久怀念，“以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形象鲜明、意境隽永、手法细腻、风格质朴清雅而受到观众的喜爱和电影界同行的赞赏与敬重。”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水华还拍过一部非常失败的片子，是他自认为“最不成功的作品”，这就是 1954 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土地》

《土地》的编剧是郭小川领衔的一个创作组。郭小川虽以诗歌闻名于世，他参与的几个电影也是很出色的。比如他在 60 年代写的艺术性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鼓荡起多少青年的热血，吸引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边疆？他在 57 年创作又在 59 年受到严厉批判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被张军钊、张艺谋等改编成同名影片，成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在电影史留下精彩的一笔，也是因为长诗提供了一段“任何史书，无论正史、野史，都找不到的”故事（张军钊语），描绘出极具特色的人物群像。郭小川在 40 年代，还写了半部生动细致的土改小说，其中人物、对话、情节都显示出他具有这方面的创作才能。

但是，据电影评论家、曾任北影《电影评论》月刊主编的马德波先生说，《土地》这样一部编导人员“花了大力气、费了可能最长的时间、很下功夫、不计成本”创作出的影片，而且是“党和国家非常看重，寄予很高的希望，并且给予了最好的条件和各方面的便利”的影片，“在艺术上却不行，不好看”。尽管经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农村进行免费放映等等，还是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成为一个“艺术的败笔”。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罗艺军先生

也说它是“很不成功的典型”。在电影史上，这部影片评价不高，很少被人提及，甚至已经被遗忘。

《大决战》的导演史超先生告诉我：

到现在为止，也没听说哪个人赞扬《土地》这个电影的。某些剧本很多人说不好，但也有一部分人说还可以，可是《土地》在我接触的人里就没人讲过还不错，还好看的。我有一次去湖北，听省委的人也说，大家对它不感兴趣，觉得不怎么样。

电影研究学者吴迪也说：

《土地》几乎就没反响，因为上边就没看好这个片子，不是不够好看——当时没有“好看”这个标准，不提娱乐性，就提思想性——是思想上政治上没有达到上边要求的高度。这是互相联系的，因为政治上的要求太高，就没法感人，不感人，没有票房，就反响小，可当时又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成为一个经典，一个指南，像《白毛女》一样。可他们拿各种概念、条条框框束缚这些编剧，这些编剧都是大腕，是懂得艺术的人，可就是弄不好一个剧本，讲不好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不让你讲好这个故事。

吴迪还说，这部影片失败与当时的电影政策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它是在《内蒙的春光》受到批判后成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的错误指导下，盲目追求重大题材，史诗性作品的产物。”

创作组和创作过程

这个五人创作小组是在中宣部、中央电影局和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专门从全国抽调人才成立起来的，成员还有梅白、俞林和李冰。马德波说：“为创作组选的几位导演和作家都是第一流的，由懂政策的、文学方面的、实践方面的各方面的人组成”。梅白，当时大概是湖北黄冈地委宣传

部长,算是土改行家,尤其熟悉地方情况。俞林,时任中南艺术学院副院长,也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李冰为中南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发表过诗作。

创作组成员首先开始广泛地收集素材。中南局邓子恢等领导人直接安排,让他们到湖北黄冈地区新洲县参加土改,在一个村子里一蹲就是一个多月,然后又用两个月时间跑遍中南数省,和省地县乡的各级干部群众开座谈会,郭小川记下了十几万字的采访笔记。

然后进入写作阶段。大约从1952年5月开始,全组集中起来进行剧本的讨论和写作。夏天,专门安排他们北上避暑胜地北戴河住了两个半月;秋冬季节,又几次集中于黄冈或是武昌东湖的招待所。此阶段耗时一年以上。

影片到1954年2月摄制完成,其后的审查和修改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55年4、5月份才开始公映。这时,全国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影片没有起到在我国农村指导土改实践的预期作用。而作为一部故事片,它又不好看,尽管它有一流的导演、编剧,还有一批出色的演员里坡、王一之、李壬林、叶向云、胡朋、郭允泰等。

《土地》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一个距井冈山几百里的乡村竹林乡,片中主角是谢成刚——一位年青的民兵队长,后来当选为农协主席,是个烈士之子——他的父亲在20年前领着乡亲们打土豪时被白匪军烧死。反面人物有地主兄弟二人,一红脸一白脸,老大谢子斋两面三刀,是个笑面虎;老二谢子奎横蛮暴虐,是枪团团长,外号“二阎王”。其他角色包括老实、胆小而落后的农民谢老寿、徘徊游疑的富农分子谢家富。地主的角色极尽阴险毒辣,始终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开始是密谋煽动农民抢仓库的公粮,然后又编造假分田名单,挑起石、谢两大姓之间的矛盾,最后又密谋杀死谢成刚。而谢成刚始终勇敢坚定,只是有时看不清斗争的复杂性,这时他总是需要区委书记王正良的领导和启发。最后,成刚揭穿了地主的阴谋,用阶级仇恨教育了落后群众,把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斗倒地主分了田地,走向了通往社会

主义的康庄大道。

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国后,电影被认为是“最大众化和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又是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的有力的武器”;因此,是“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而且,“电影是国家的艺术,电影艺术作品担负着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和对党与国家的政策进行宣传的重大任务。因此,需要有国家的计划。”(《电影创作通讯》第7、9、11期,1953-54年)这样,电影创作就处于高度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之下,中央电影局对全国电影业的管理严密而精细,具体到每一部影片的审查和通过发行,比如,50年代初期的影片片头上都印有“中央电影局监制”的字样。而且,制定重大业务方针、决定投产哪些重要题材,都需要中央文化部、中央宣传部甚至更高层领导的审定。

另外,当时我国全方位奉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边倒”政策。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在原则上只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开放,而与西方和港台电影处于一种基本隔绝的封闭状态。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从美学思想上受到苏联电影的深刻影响,在管理体制上也照搬了当时苏联的套路。

罗艺军先生告诉我们:

二战以后,也就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的主导方针是写大题材,搞史诗样式,通过大事件、大背景、伟大人物颂扬苏联,颂扬斯大林。代表作有《宣誓》《攻克柏林》等。把斯大林写成至高无上的英雄,实际上是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服务。群众中也得写几个人,但不是作为个人形象,而是工人阶级的形象代表,比如《宣誓》里的老母亲。苏联的这种搞法恰恰迎合了中国一些比较“左”的人的想法。当时电影创作定的主题主要是要根据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采取的方式是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提出一批重大主题,先定题材,题材确定以后,再派人下去体验生活,写出剧本。《土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资产阶级改造等。一般剧本通不过,因为一般作家写的还是身边的生活。

写作剧本都派作家承担，大部分无疾而终，有的写成了也通不过。比如写抗美援朝，派了三个大作家写剧本：刘白羽、黄钢、华山。他们写出来了，要用一部片子概括整个战役，下面还得写战士的英勇，还有师级的、军级的，各方面都要照顾到。一般都得写两三年。最后一稿我看了，也不容易，可还是没通过。涉及的东西太多，比如金日成如何表现？他的朝鲜军队被打得丢盔弃甲，才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去，这能写吗？而且只写彭德怀，不写毛泽东行吗？如果写毛泽东，又怎么写？一般编辑不参与讨论，具体不知怎么否定的。最后真正拍成的就是《南征北战》和《土地》两部，《南》现在看还算比较好，陈毅指导过创作，他的有些意见帮了剧组的忙。《土地》是很不成功的典型。

土改的意义及电影《土地》的使命

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项最基本的内容，在建国初期被中央定为八项工作任务之首，它是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首要条件，也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土改如此重要，就必须在土改进行过程中对农民进行引导和教育。当时有文章写道：

教育农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向“汪洋大海”般的五万万农业人口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当然是需要极其巨大而持续的宣传工作的。在这一工作中，电影艺术应该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宣传威力，因为一部影片的放映，很快地便会接触到广大的群众，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据统计，舞台短剧《赵小兰》拍成影片之后，半年内的观众数目达1,400万人次之多，故事影片《一贯害人道》半年观众数目是1,800余万人次。（《电影创作通讯》第11期）

马德波、戴光晰在论文《评水华的作曲曲线》中说：《土地》的题材来自领导意图。当时我国有些领导同志展望世界革命发展形势，预言广大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必将走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把中国革命的重要经验用电影的艺术形式介绍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必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主张拍摄一部有关土改的教科书式的影片，宣传土地改革的伟大

意义，宣传有关土改的基本政策和实施过程，以便供人仿效。

据郭小川的笔记，人称“位老”的郑位三老人（1925年入党，建国后因病未负责具体领导工作）在剧本写作开始前指示说：这个片子有两大任务：一，巩固土地革命，认识意义重大，从农民方面看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此认识不够，把认识巩固起来，这才有政治力量；二，影响印度等几亿人口，以印度为第一名，这片子可以发生莫大的政治意义，中国的土改比十月革命后的土改更完备，规模更大，而且是在更落后的国家。应以此为中心任务，片子要发生政治力量，以此为出发点，以过去历史为材料，不然单纯写历史没有意义，越完成这两点，电影越成功。

具体地说，这个电影要求全面反映土改中各个阶层人物的态度和土改政策的各个方面，成为指导土改工作的教科书（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72页），要进行宣传和普及，从原则、理论到具体实践进行指导，要表现土改的全过程，以及实践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会经历哪些阶段、如何对待的，是搞这样一个可操作的、可具体指导实践的教科书式的作品。它的影响不仅是对印度，也包括对中国非常信任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马德波口述）

这部影片受到党中央的特别重视，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对郭小川说，这片子如果写得好准备拍成五彩片。那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五彩片，也是1953年的唯一一部五彩片（郭小川1952年7-8月信）。

高层领导多次做指示

在剧本写作过程中，邓子恢领导过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华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并参与中央一些重要土地政策的制定的中共农民土地问题专家）、杜润生（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局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等高层领导多次做指示，他们——按马德波的说法——“都是最有权威的人，都是当时的‘土地爷’呵”。

1951年12月，杜润生对创作组人员谈话：

对这部影片的要求：是国家出品的，代表反封建斗争的描写，反封建阶段胜利的结束，气派要大而深、广，不是仅仅写一个故事、一件事、一个村庄，不是简单的对农民生活、地主的描写，是结束过去的历史，开辟农村的将来。要有典型故事，也要有记录性的东西，党的领导要有省一级的领导。表现斗争要把人民解放军表现进去，剿匪、镇反均应写到。……新的人物如何表现？领导要合乎共产党员的标准。为了表现他，总要黑白对比。……基本群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盲目性，一方面要写创造性。中农的动摇不要写得太厉害，消极就够了；青年要积极一点，勇敢，加上老年人的智慧，妇女获得土地又获得婚姻自由；知识分子不要挖苦得太厉害，表示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挖苦他不深入、有个人打算、小资产阶级情调。（据郭小川笔记，下同）

相隔几天，李冰从北京带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等领导人的指示，指出剧本存在的几个问题是1，对农民的伟大力量表现不足，党的领导表现薄弱，地主气焰过高，启发群众智慧不高。2，现在的剧本受自己占有的素材包围着，概括力不足；农会副主席过分狭隘自私，中农积极性不够，狗腿子太多太嚣张，两个地主的联系不够。3，显得庞杂，像是素材的堆积。周扬直接提出，“要提高到理想化”，并具体提出修改意图：要集中全力表现阶级斗争，战略上我方应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垮敌人；要加强表现党的领导，县委应当出头，加强主要的人物如石强的机智和与群众的联系，狗腿子应当是流氓思想，落后农民。要重新结构故事线索。地主不要都写成反革命，不要过分强调社会主义远景，重要的是工农联盟问题。

类似的指示还有很多，可惜郭小川只记录到52年10月为止，不久他就离开了这项工作奉命调入中宣部，影片拍摄和后期修改阶段的情况他就不了解了。

看得出来，拍这部片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用指挥打仗、领导生产的方法来指导艺术创作也就顺理成章。可以说，领导人是在用撰写文件的方式创作电影，或者说，用电影的形式制定一个文件，而且是一个指导全中国、甚至其他国家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各级领导高度

重视，亲自进行多次的具体干预。然而，创作人员却在此干预下迷失方向，越写越写不出来。

创作过程之艰难

郭小川把这次写作当成光荣的战斗任务，他给妻子写信道：“现在担负的任务是很光荣的，通过一个影片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以教育如此广大的人民和我们的后代，难道还不光荣吗？”但是创作之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到北戴河的第二天，他在信中说：“我深深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休养，而是工作呵，我们的任务多么艰巨，在北京，很多同志听了我们的计划，都替我们发愁。我们商量一下，准备每天工作10小时，没有礼拜天，每天只中午去洗洗海水浴，早晚散散步，别的时间全部投入工作中。”工作，真愁人！每一步都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创作是困难的，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愁人的沉思中度过……这一次所遇到的困难，有时简直叫你灰心丧气，叫你感觉自己太无能，叫你罢手，坐到竹椅上思索几小时，常常一无所得……”几天来，心情是格外地郁闷，主要是因为工作又遇到了新的阻碍，今天闷坐终日，竟无一得。这一关过了，下头就比较容易了。在这里已工作了16天，却只弄到反霸减租转到土改，现在是想写一场激烈的反分散斗争（揭露土改初期地主阴谋），想了两天，还没有出路，可见这事的艰难。”

创作组1952年5月中开始讨论剧本主题，5月底开始安排片中人物，到了8月11日，也就是他们以全部精力写作3个月之后，居然还没有动笔，只是“接近动笔的时刻了”，写作方式是先用一些天“把详细细节拟定”，然后“开始分头来写”，执笔者“原打算只俞林一人，现在为了节省些时间，决定我、俞林、李冰三个人写”，计划是“9月底以前无论如何要写出一个东西来，也许是初稿，也许是比初稿还简单一些的提纲，10月初到北京去印出，就可以分送给领导机关去审查了。”9月15日郭小川写道：很吃力……70天以来，我们没过过礼拜天，差不多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到9月18日提纲完成，可是直到12月初“连剧本背景是否写老苏区还无法解决，搜索枯肠，仍无结果”，搞得“精神上非常紧张”。

除了领导意图与作家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创作组成员之间的意见难以统一也是件头疼事。郭小川说:“水华主张写个像白毛女的故事,我主张写运动的过程”,“我坚持从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一直写到土改完毕,历史拉得很长,人物不集中。这本是邓老的主张,我一直坚决地机械地贯彻下去。”我们并未激烈争论,不过我怕水华不通,使我违反了中南局的指示。”这中间,到中南农村搞土改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江青,还接见了创作组,提出了她的不同意见,也是认为应该写人物。但郭小川说自己“自恃有邓老支持,便对江青同志的话听不进去,很不尊敬地反驳了几句”。显然,拍过《白毛女》的水华和比较懂电影的江青,想从艺术规律出发,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而郭小川作为组长,坚持上级意图。最终,不一致的意见必须按领导意图达成一致。

创作所多次提出书面意见

当时,所有电影出厂都要经过重重审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3年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称:“必须切实建立统一集中、层层负责的审查制度。”剧本先要通过创作所和艺委会的审查,然后由电影局审查,之后还要经文化部或中宣部的审查。

“创作所”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归文化部电影局领导,它的职能之一是提供经审查通过的剧本,由电影局分配到各个制片厂拍摄;它还编辑出版内部刊物《电影创作通讯》,该刊认为,讨论创作申请书、故事梗概和电影剧本,是帮助电影剧作家进行创作的基本形式。

在这种制度下,创作所为了“供给领导处理剧本时作为参考”,对《土地》剧本多次提出书面意见。1955年该所编辑罗艺军撰文,对这几次意见进行回顾检查,说1952—54年之间,“编辑部对《土地》历次文学剧本共提出6次书面意见,其中包括有编辑部成立前选稿联络组的1次书面意见,1次送审意见,及1次送审后修改稿的意见。”这6次意见不完全由一个人执笔,而同一执笔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剧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因此历次书面意见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文中还说,现在看来1953年3月意见的重大缺

陷之一,是没有“帮助作者明确”剧本作进一步修改时的主攻方向”是“突出谢成刚”,因为“这个正面的形象”还不能算是已经达到了典型的高度”;重大缺陷之二是“对作品进行的分析,大都是从一些政治和艺术的教条出发,将这些教条生硬地套在作品上”。文章又说,那次书面意见曾对剧本“没有拘泥于土改过程的叙述”加以肯定,但是现在的看法是,该剧本“在创作方法上的缺陷首先表现在作品的主题的获得,更多的是来自理论概念,而不是更多地孕育于作者实际斗争生活之中的感受”,说主角谢成刚“不很像我们在生活中所熟悉的感到亲切的农民”,作者“将这个人物导向‘理想化’与‘简单化’了”。(《电影创作通讯》第17期)

读者可以看出,当时创作所的意见本身就前后不符,很不统一,一会儿考虑的是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一会儿又考虑到政策的图解和影片的政治任务,在这难以兼顾的双重要求之下摇摆不定。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根据这次对《土地》历次意见的检查,深深地感受到在我们过去审查工作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的问题。如何迅速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争取出产更多更好的电影剧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课题。”但是,我们知道,创作所再努力也不可能“审查”出好剧本来,他们的多次干预、左右摇摆只能使创作人员不知所从,使他们的才思枯竭,灵感窒息,生拉硬挤地进行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写出好东西来。

《土地》的社会评价和失败原因

这样,1953年全年,算上《土地》,创作所总共只完成了13个故事片文学剧本的任务。当时文件中也反映出剧本严重短缺的情况:

“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剧本荒,从而也就影响到近年来各个电影制片厂的生产工作时常陷于停工待料的状态;引起广大观众对目前新的影片的数量和质量感到不满;造成直到目前在我们的文学报刊上作为文学的特殊样式的电影文学剧本,仍如凤毛麟角。”(《电影创作通讯》第9期)

产量稀少,质量也不如人意。1954年《土地》刚拍完,就有文章批评它的主要人物形象“弱于

次要人物，或正面人物弱于反面人物”，说谢成刚没有谢老寿的形象生动和突出。谢老寿是此片中藏匿地主的一个贫苦农民，性格怯懦犹豫，对地主又恨又怕，内心备受煎熬，算是所有人物中惟一一个比较真实的人物，马/戴论文中说这是“唯一有个性的人物”，当然比其他虚假人物有意思了。

现在看来，此片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它远离生活，概念化、公式化，与后来的样板戏如出一辙。马/戴文章分析：“这部影片体现着当时风行的理论主张，具有一大（大题材、大主题），二高（人物高起点、思想觉悟高），三直（直接表现阶级命运，直接表现‘本质’）的特点。”文章接着把《土地》与《白毛女》进行比较，说可以看出，后者“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展示、发展、遭遇的变化体现广大农民的命运”，而前者“则着眼于两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正面的、全面的斗争”，“喜儿的形象虽经水华‘纯化’，仍是一个有个性，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物，谢成刚则是按照‘阶级本质’的概念加工定制的……他没有个人的欲望，没有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表达方式，一切都是由按照概念预制的配件组装而成的”，“一切”应有的‘那些’‘本质’‘特征’样样具备，但就是缺少艺术形象的生命”。因此，《土地》的人物让人爱不起来，也记不住。

孟犁野在《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中分析道，《土地》存在的“根本性的缺陷与弱点”，是“片面追求高、全”，一是“片面追求人物全、事件全”，二是“不适当地追求人物形象的高大”。从事件上看，它“企图全面反映农村中各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和斗争”，“企图把土改工作的主要程序如清匪反霸、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露地主制造假分田的阴谋等，都塞入取景框内”，还“企图通过一部影片概括中国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20年间的斗争面貌，体现这种斗争的全部复杂性、尖锐性与艰巨性，写出农民和地主的‘最后一次决战’”，并且企图把片子拍成“一部能使人们全



郭小川

面认识理解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形象化教科书’”。这是该片失败的主要原因。

凭空拔高人物形象，或者说拔高正面人物、丑化反面人物的做法在《土地》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以第一号人物的出场为例：在一个“风刮着，雪下着”的悬崖边上，谢成刚“衬着后面盖着一层薄雪的山石和彤云密布的天空，身材显得格外高大”，和他同行的两个民兵“喘着气，冒着汗”，“筋疲力尽地返身欲坐”，说“真饿坏了……先回家喝点菜汤”再去搜查地主；而成刚则“把步枪背着，抓着枯藤，腿一撑，腰一挺，一边矫健地往上爬，一边转过脸来说着，他那沉重的声音里激动着仇恨和决心：‘二阎王就是钻进石头缝里，我也要把他撬出来！’狂暴的风雪卷着他，他奋不顾身地往上爬，山谷里震动着他那金石般的声音……”这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是人为的形象拔高，二是作为仇恨的化身。仇恨实际上是贯穿整个影片的基调。

地主的形象塑造也是这样，一是妖魔化，即丑恶、凶狠的极端化，二是完全的脸谱化。如地主露面的场景：桌上摆着“残余的鱼肉酒饭”，“黯淡的灯光摇晃着”，谢子斋“咬了咬牙，气恼地拍着桌子”，或是“呲着牙，瞪着眼，哑声嘶叫着”。地主的行总是山在洞或者密室里策划阴谋，也就是说，他们从始至终面目狰狞，恶毒透顶。

作者这样写，一方面，是土改斗争的需要。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理解，推动历史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制造社会震荡、制度颠覆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所以，必须在人群中划分敌我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夸大对立的程度，把矛盾极端化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程度，然后，用仇恨发动起农民，用斗争来推动土改分田等运动的完成。

剧本与郭小川的土改小说形成鲜明对照

电影中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令人们仰视，却

令人们疏远；反面人物邪恶狰狞，仿佛地狱里钻出来的恶鬼。人们要问：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存在吗？让我们看看郭小川在参加《土地》创作组几年前写的一部未完成小说《变乱》（载《郭小川全集》卷4）。

郭小川1945年从延安派到热河省东丰宁县当了两年多县长，在自己的家乡领导了清匪反霸、土改分田、地方建政等斗争。1948年的春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一个布面横格本上用流利而细密的钢笔字写下了7万字的小小说草稿，这是他拟写的长篇小说《潮河川的浪纹》的第一部《变乱》的前13章。当时，他写得非常顺畅，一下笔就是四五千字，一气呵成，速度几达每天一章，鲜有涂抹的痕迹。显然，新鲜的生活细节扑面而来，流泄到他的笔下，这部残篇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还未经过足够的构思和加工的写作素材。尤为珍贵的是，这半部小说从未发表过，对比其他几篇发表了郭小川小说，《变乱》最真实，未经过概念化的修改。

这13章写的是一个村庄里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发动群众的经过。在一个“满洲国”12年统治刚刚倒台、“老蒋的中央派”和“八路军派”争夺管辖权的地区，村里的执政者是甲长刘仙洲和十几个牌长，不过大局的掌控离不开宋、徐两大财主的合作，因为他们是大部分田地的主人，又有势力、有文化。当过多年甲长的刘仙洲既非富人也非穷人，他的“宗旨就是维持地方”，“对哪派也忠实热心”，“哪派来了也离不了他”，“穷人富人面前都有个好字”，他最重要的能力是调解矛盾，抹平分歧，是村庄的粘合剂——和事佬。这恐怕是乡村中最重要的角色，所谓“和为贵”、“和气生财”，“和”则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乱”则生产力破坏，社会动荡，“乱”是一般情况下老百姓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不少佃户和地主处得相安无事，认为按约定交租是守信用的表现，是应当遵守的为人处事准则。和地主宋二爷有仇的主要是年青气盛的方家宝，他们结仇首先是因为方家遭遇了天灾人祸——家宝10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家里没了劳力断了收入来源，欠的租子本利相滚无法偿还，家宝不得不去给人帮工；二是因为他个性强、脾气倔，不是像许多农民那种驯顺的性格；三是因

为他说的媳妇被地主的儿子看上了，二人成了情敌。结果，地主家抓住他的把柄，利用权势给他告了官投了狱，又利用文化写了“头头是道、言之成理”的呈子，把他整得家底精光、人财两散。

共产党干部来了以后，便动员群众报仇申冤，斗争对象将被“均产”。不过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地主，而是一个家里是“三等户”却“比大户都恶”的郑有德，他当过“部落长”和牌长，跟官员、警察有点儿来往，常常利用权势打骂百姓、骗人钱财、霸占别人老婆。结果，在群情激奋的诉苦会上，他被众人用鞋底和乱拳活活打死。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物都不是简单或者完美的。最先派来“改造政权”的副区长李永，是个“不爱做政权工作”的八路军干部，一来就住到地主宽敞干净的大院子里，吃了地主的酒肉招待觉得挺受用，他没有发动群众就进行了选举，结果选出十几个“阶级阵线”不清的干部。贫苦农民李兴为人比较公正，但不识字，胆小。另一个农民鲍越如很有斗争性，却抽大烟。

可惜，作者没有找到机会写完这部大作，今天的读者无从得知，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将怎样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乱”中改变自己的命运。

另外，在同一个笔记本上，作者还记下一些创作素材，里面有几个人物素描值得一提。一个人物姓范，“是流氓，好耍钱”，在“满洲国”当劳工头时曾克扣工人工钱，清算时表现积极被选为村长，又提拔到外区做武委会工作，后来又帮助大地主报复共产党干部，最后被干部抓住用石头砸死。第二个人物是一个区干部，去抓大地主，但因大地主曾说好话救过他，就把眼前的猎物给放了，放了以后又后悔，追了一程没追上，此后这事一直不敢告人。第三个人物非穷非富，把儿媳妇当姘头，还奸过自己的妹妹，他“跟大地主骂穷人，跟穷人骂大地主”，八路军来了以后，儿子只好管着他不让出门。

我们相信，这些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对比这些真实的生活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剧本是根据意识形态要求集体生产的遵命产品，它的人物远离作家的实感，自然难以写出生命的活力。

（本文作者是郭小川的女儿）

（责任编辑 吴思）

吴 宓 “ 偷 书 ”

何 蜀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1966年“八一八”之后，京城红卫兵开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经各大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连日里欢呼“好得很”，大张旗鼓、“狂轰滥炸”般的宣传炒作，此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争相仿效。重庆的抄家，是从8月下旬开始，由党政领导支持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一般是由各地区各单位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拟定的。

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因年高（1966年已73岁）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已经长时间没有安排他上课。但他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也不能幸免。8月31日，西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中文系先抄了潘仁斋、郑思虞等教师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

后来在1967年除夕之夜，吴宓在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下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

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

吴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还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他就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对这场“大革命”尖锐的评价：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吴宓说“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当然不是把方敬比作董卓，而只是借用这一历史典故来说明自己在“红色恐怖”下面临的可悲处境：不敢对有知遇之恩的人遭难表示哀痛。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使用了这一典故：

“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

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各种“罪行”的文章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

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这天日记中，他还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命名，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

“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恐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

此后，西南师范学院的形势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先是造反派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夺了权，打垮了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着八三一纵队又在1967年3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组织”，被迫解散，西师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团掌权。4月初开始“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八三一纵队恢复活动并得到平反，与春雷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但不管当权者如何演变，吴宓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始终处于被惩罚、被批斗、被监督管制的地位。只是直接监督管制他们的人员不断更换而已。

1967年2月8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国务院已于1月29日宣布：“当前正处在



吴宓(1894—1978)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因此吴宓当天仍在教师“劳改队”参加了劳动，做三教学楼和中文系办公室的清洁。当晚，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

“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歿）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1966年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

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

74岁的老人吴宓,就是在这样“不胜伤心愤恨”的心境中冒险“偷书”的。

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春雷造反兵团获胜后撤走。7月,八三一纵队被赶走,春雷造反兵团打回学校重新掌权。因为两派已陷入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而让他们几个老师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天进行学习(读报纸和毛泽东的《语录》、著作等)。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视察,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信心和勇气。十天后,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出了意外,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是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

“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坐宓后之刘又辛君,似未之见,此外无人注意。”

所谓“写大字报”,是指他们被强迫为春雷造反兵团抄写大字报。凌道新,是历史系教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在他们这个学习小组,而在“劳改队”(后于1974年初被迫害致死)。吴宓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

“又私取抄去之书物归,今日上午是其最后(终)机会,盖今日下午即有中文系革命教职员来本室视察整理,随即用锁扃本室门,宓不得再入此室随意取回书物矣!”

但是,吴宓仍不甘心。此后他又继续了他的“偷书”行动。11月2日,他又发现了机会:

“11—12教师阅览室门开,宓乃入内,整理所抄去宓之书物,乱堆地上者,粗毕。乘间私取回(一)《雨僧杂稿》零页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记》第一册以归。”

12月7日:

“3时,至中文系上班;众皆未到,系内无人。成君遂为私启教师阅览室门,俾宓潜入,私取得(1)《虚无夫人》卓浩然剪贴本(2)《色戒篇》(3)《印光法师嘉言录》(4)《吴宓诗集》一部。即携归舍。”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后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春雷人员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这天日记中,吴宓还写了当晚凌道新来看他时,他“命新以《印光法师嘉言录》带交樊阅。”樊“指曹慕樊,中文系教师,“右派分子”;与凌道新同在“劳改队”昼夜看守学校的茅厕(不让外人来偷粪)。”

12月25日,吴宓“得寸进尺”,向成文辉提出要求:

“夕,成文辉来……宓托成君:……(二)得便,放宓再入教师阅览室检书物一次。——成君颌之而去。”

两天后,12月27日上午:

“成君为开教师阅览室门,俾宓入内,取得(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全一份(二)Just Oxford画册等,暂存。(三)《古今通俗小说》三册,付谭君读。”

“谭君”指谭优学,中文系教师,与吴宓同在一个“牛鬼蛇神”学习小组。

从吴宓的日记中可知,吴宓不但冒险“偷”回自己这些被抄走的书物,而且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带交”尚在“劳改队”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传播封资修黑货”、“放毒”的“反革命”行为。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

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那场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的反抗。

(责任编辑 吴 思)

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

方朔



三十年代的萧军

我的父亲方未艾和作家萧军生前是 60 年的至交，父亲生前曾写下 5 万余字的回忆录《我和萧军六十年》，最初发表在《东北文学研究丛刊》1984 年 8 月第一辑上，后收入辽宁省政协和本溪市政协 2004 年 4 月共同出版的《历史珍忆》一书。我作为晚辈，对萧军的一生，别有一番认识和感情。

萧军写入党申请书

萧军在晚年，曾写下一首《题虎月图》的诗，

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啸群山百兽惊，苍茫独步月朦胧。饥寒历尽雄心老，不许人前摇尾生。”

对萧军稍有了解的人，大多知道他是一位 20 世纪 30 年代来自东北的作家，投奔上海后，很得鲁迅先生的爱护和提携，以发表我国第一部反映东北抗日斗争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闻名于世。他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伟大的人，是我平生唯一所崇拜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人，能感动我如此地深，如此地长久，如此获得我毫无保留地崇敬。我是以一种宗教的情绪在膜拜他，他凝定了我那不安的灵魂，铸定了我底那流动的意志，使我终生为文学和革命而奋斗而献身！”

他公开对人讲：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萧军一身侠骨豪情，狷介耿直，独立独行。1938 年、1940 年，两次去延安。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赞赏地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

然而，1948 年中共东北局在对萧军的《决定》中，把他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萧军就开始被压得喘不出气来。1958 年 2 月，《文艺报》在编辑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就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67 年，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把他定为“反党分子”。在“革命造反派”的批斗中，把他定为“老牌反党分子”。直到 1980 年 4 月 21 日，中共北京市委给萧军的《复查结论》才写到：“这种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此时，萧军已被驱除文坛 32 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中年人，变为饱经忧患的 73 岁老人了。

萧军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有据可查,1948年,从延安到哈尔滨的萧军,给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已经调任到北平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8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意,接受萧军为中共党员,并由东北局正式通知了他:“可以参加所在党小组生活”。

萧军为什么此时提出入党呢?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延安的党中央派彭真等人,去东北建立东北局和民主政权。离开东北家乡多年的萧军怀着“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之决心,在延安主动提出要求去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

11月中旬,萧军离开延安前,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又一次对萧军说:

“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的一切特性,创造性……”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

“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做大团结里的小摩擦……”毛泽东对萧军说了这番话,很令人感动。

1946年8月,中共东北局作出决定:任命萧军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随后东北局书记彭真派专人,迎接萧军赴东北。

萧军辗转到了哈尔滨后,不顾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自身的安全,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活动中。五十天左右连续到各单位、机关、学校,作了60多场的专题演讲,听众达七八万人。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阐明民主政府的主张,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将群众提出的2000多个问题,分门别类,整理出四大本子,交给党和政府做参考。

1947年初,在彭真的支持下,萧军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亲手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随着在哈尔滨做的大量工作,萧军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当时,东北局的舒群诚恳地劝说萧军尽快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1948年7月25日,桀骜不驯的萧军生平第一次向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全文如下:
凯丰同志:

多少年来,我留在党外,这决非从任何个人动机出发,而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这是我的认识——几次和彭真、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志谈到入党问题,我是坚持这看法,同时也觉得自己思想、感情还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

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内的时期了——因此我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请你转达东北局,如何考虑给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转达,并托他口述一切。此致

敬礼!

萧军

1948年7月25日

从这封信的口气、态度及所述的经过看,当时萧军提出入党,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趋炎附势,的确确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内的时期了”。

这样姿态的入党申请,非同寻常,与萧军的性格和秉性相符,与他当时的经历、思想和对党的感情也是一致的,看不出有何勉强和做作。

其实,在彭真离开后,萧军已开始受到排斥和讨伐,只是心地天真的萧军并没有想到会对他采取那样的态度和手段。

让我们继续往前搜寻萧军的入党经历。

在延安曾口头提出过入党

萧军先后两次去延安。第一次是1938年,毛泽东听说他来了,主动看望并请吃饭。第二次是1940年6月,萧军携妻奔赴延安。毛泽东主动请他帮助收集延安文艺界的意见和情况,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毛泽东的讲话。之后,萧军由于看不惯一些共产党人的作派,愤然离开下乡务农。1944年3月,萧军和夫人王德芬领着孩子,在延安县刘庄山沟里,度过了一段自食其力的村民生活,被毛泽东召回了延安,住在中央党校。

1944年4月11日,萧军在日记里写到:“刘白羽第一次和我谈关于入党的问题,我说对此问题我由乡里来就考虑过了,我到党校来,这就是对共产党接近的一种表示……”

1945年2月11日,萧军在看望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时,两个人直接谈到入党的问题。彭真

说：“从各方面我们考察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记等完全相信——是我们的同志，关于入党事，原则上毫无问题。只是我代你考虑的，只是‘纪律’，因为它是个集体啊！”

萧军的回答是：“究竟共产党认清了萧军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为中国人民负责……我考虑过了，还是不入为好。第一，我还不能很好把握控制自己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弃个人一些自由享受性；第三，我还没有决定是以文学创作占第一还是其他占第一……”

对此，彭真十分理解。他知道，一向孤傲的萧军，能有入党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天的谈话，俩人谈得极为融洽、透彻。

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当然都记得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那一幕。1942年6月4日这一天，萧军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耐烦了，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

散会后，萧军在路向同行的人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尿盆子”，被人向党组织汇报了。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要求，还将四名代表轰出门。

其实，萧军与王实味并没有私交，只是有着一般的同志关系和应有的良知、良心。

1942年10月2日，早晨刚吃过饭，萧军在门口站着，王实味从山下走上来。手里拿着写好的一封信，喊萧军要单独谈一谈。在山坡许多人的注视下，王实味将手中的信交给萧军。信的开头一行是“伟大的乔、转呈伟大的毛主席、转党中央：”，这是王实味头一天写的，信中写到“为什么人在如‘象’‘如’‘熊’更能解决问题时，却是蠢到非用‘狐狸式的小狡猾’不可呢？……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反革命呢？……为什么



1930年萧军(左)和方未艾

鲁迅临终时要拉着许广平底手按在他心上呢？……”

萧军当天就把那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并附上几句话：“泽东同志：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让我交给文抗支书，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萧军”

1942年10月19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当众重提旧事宣读了《备忘录》，触犯了众怒，当场就有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萧军一人对众人，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主持会议的吴玉章出面调停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才使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应当检讨检讨。”萧军听后主动和解说：“吴老的话还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

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丁玲毫不留情地回敬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腾地站了起来,拍案大怒:“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们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这样的一位萧军,日后能要求入党并为党所接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早在东北就与共产党人有交往

萧军与共产党从20年代就开始有交往。在方未艾撰写的《我和萧军六十年》回忆录中,记载到:

“1928年是东北军阀变动很大的一年。6月,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时,被日本关东军使用阴谋炸死在皇姑屯,同时被炸死的还有黑龙江军事督办吴俊升。这时在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公开了。东北三省都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还秘密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和由关内转移来的地下共产党员,进行严厉清查,残酷迫害。

萧军来到沈阳北大营参加了军事学习,不久,王宜之也从舒兰来到了沈阳,住在工业区东北军事政治训练班学员叶开的家里。叶开是上海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地下共产党员,当时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工作。在叶开家住的还有一位孙东垣,辽宁省黑山县人,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最早的毕业生,和张学良是同期同学。

王宜之和孙东垣有时到北大营去看望我和萧军。我们在星期日也去工业区看望他们。他们介绍我们同叶开认识,还认识了叶开的同学黄稚明。由于他们同王宜之和孙东垣是互相信任的好友,因此,同我们认识不久也信任了我们。叶开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关外》杂志,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宣传品不断地送给我们阅读、学习。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

物。”

“九一八”事变后,萧军和他的朋友方未艾参加冯占海的抗日部队,失败后进入了哈尔滨,从事文学创作。1932年,方未艾加入了共产党,与党员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金伯阳、黄吟秋、舒群、金剑啸等有着密切关系。萧军和萧红生活在一起,与方未艾仍保持亲密的往来,同时还与共产党员金剑啸、金伯阳、黄吟秋、舒群、罗锋、侯小古等有着密切往来,并参加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萧红在家中,还为党的地下刊物《东北民众报》用蜡版刻金剑啸的画稿。

萧军和萧红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跋涉》小说集,被日本特务机关上了黑名单,1000册书也被没收焚毁。1934年夏天,夫妻双双逃到青岛,投奔在青岛的中共地下党舒群,萧军和萧红两人分别写出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并得到党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青岛晨报》负责人孙乐文的帮助,向鲁迅先生投去一封信,很快得到回信。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被捕,萧军和萧红在中共党员孙乐文帮助下逃离青岛,投奔上海的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帮助下,出版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两部长篇小说,由此奠定了萧军和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萧军参加了左翼文学活动,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又到了武汉,和聂绀弩、胡风创办《七月》刊物,险些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丢进长江,幸亏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才脱险。之后,去临汾、西安、兰州、成都。萧军在《新民报》当编辑,上了国民党的暗杀黑名单。

当时,他公然宣布:“我的资本——脑袋一颗。我的武器——尖刀一把。我的办法——两手换拼个你死我活),到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过去。”为了预防不测,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通知他及早离开。萧军到了重庆,在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的帮助下,带着妻子和舒群等人化妆逃离,投奔延安。

入党后30多年的磨难

萧军在1948年8月被中央批准入党,并没有因此得到东北局党组织的任何关照,反而遭到东北局刘芝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人的围

攻和批判。

1947年,萧军在东北局的支持下,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和主编,在报上发表了自己写的一些言论。当年夏季,东北局宣传部自办了《生活报》,由宣传部秘书长刘芝明为领导、宋之的为主编。这样,当年,鲁迅先生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和国防文学派的论争,在哈尔滨又以新的主题和形式以萧军和刘芝明为两派代表,重燃战火。萧军寡不敌众,于1948年11月20日被迫将《文化报》停刊并离开哈尔滨。

随之,刘芝明在东北地区组织了为期3个月的“萧军思想批判”,于当年5月在《东北日报》发表了东北“文协”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以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把萧军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

萧军不服从这样的处理决定,对刘芝明说:“我的文化报是白纸黑字,你的生活报、‘萧军思想批判’,也是白纸黑字,都擦不掉抹不掉。到底谁对谁不对,20年以后再看……”萧军被下放到抚顺矿务局总工会,在被扣下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和供给关系的情况下,到了北京找市长彭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

在北京,萧军先是到市政府的文物组当了一名考古人员,没有工作关系,养活一家九口人,每月只能领120元的生活费,难以维持。萧军还是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和《第三代》的创作,修改了旧作《八月的乡村》和京剧剧本《武王伐纣》。然而,出版遇阻,1954年9月,勉强再版了《八月的乡村》。10月,出版了《五月的矿山》,但很快被批判,成了“禁书”。1958年,中国文联机关的《文艺报》把萧军同丁玲、冯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并列一起批判。萧军发表文章的路子无望,用4年时间学习中医,“弃文从医”也未成愿。在彭真的帮助下,只好到北京戏曲研究所当上一名研究员。1960年,萧军开始创作40万字的京剧剧本《吴越春秋史话》,1962年完成,结果是“不予出版”。

对于一名作家,作品不准出版,无疑等于将文学生命判处“死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将萧军置于死亡边缘。日常的批斗、抄家、关押尚可忍受,8月23日,萧军和老舍、骆

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遭到红卫兵轮番的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就是在这天被打之后的次日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昏死过去,幸亏在火葬场被工人发现尚有口气,给拉了回来。

文革之后,萧军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1979年4月28日,接到北京市文联的通知,档案由西城区新街口办事处转到北京市作协。当年,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会上,作了题为“春天里的冬天”发言。

在批判“四人帮”中,萧军由于张春桥当年攻击鲁迅称赞《八月的乡村》是无原则的吹捧,被鲁迅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坚决回击,因此萧军和《八月的乡村》一时间重新复生。随之,萧军出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出版作品,出席种种活动……从1980年在政治上得到“平反”到1988年6月22日患病辞世,仅享有不到9年应有的荣誉和人身权利。

虽然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准,关于萧军问题的复查结论,推翻了几十年来强加在萧军头上的种种罪名,但一位作家从41岁开始,毕竟有32年的华年在悲怆中消失。

萧军是位极其坦率坦荡的人,在临终前对女儿萧耘说:“我所以追随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是它的一个忠实的老群众,就因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和我追求的目标一致:一是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是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是求得人民的彻底翻身,四是求得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如今这四大目标基本上全达到了,我没有什么遗憾!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我反对的只是那些共产党里的蛀虫!”

痛切的沉思

回顾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似乎是萧军孤傲、倔犟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其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舒群、罗烽、白朗等人,并没有逃脱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萧军如果像郭沫若在建国后那样做人做

事,在文革中失掉儿子和人格、声誉,也是生不如死。如果像巴金、钱钟书、沈从文那样不投奔延安,就能够得以免灾或有所施展吗?萧军如果在1948年入党做了官,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他能够幸免过关,能够避免丁玲、陈企霞、邓拓、吴晗、老舍、曹禺、冯雪峰等人的命运吗?

我曾有机会翻阅萧军的日记,看到他在

1943年7月20日写的几句话:

“让我自己宣誓吧!我一定要保护这个党,为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吧,经过任何损害与挫折,决不灰心。真理是战胜一切的。”

在我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悲怆……

(责任编辑 吴 思)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唐山大地震	钱 钢	28.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罗平汉	32.00	7.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刘太医谈养生	刘弘章	35.00	7.00
病是自家生	刘弘章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密 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充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 鹰	26.00	6.00
西北军演义 上下)	骏 声	68.00	8.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走进怀仁堂 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董怀周”到审江青	汪文凤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6.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自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写自己回忆录。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西北军演义》此书系《桂系演义》、《少帅传奇》之后,又一部介绍国民党非中央系武装力量的历史小说。作者根据自己家世、拜访众多的西北军后人,在查阅、考证了大量海内外出版的军事、历史、人物传记基础上,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翔实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西北军”整整20年的战斗历程,填补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一段空白。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

罗国璋

巴金老人生前呼吁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会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

2004年，广东省澄海市，一座完全由民众捐资建设的“文革”博物馆建成，圆了巴金老人的梦。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是由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共产党员、曾任潮州、揭阳、汕头市市长、书记的彭启安发起的，他在海内外筹措了900多万元，民众还自愿捐献出土地、山林、建材、实物、资料……历经七年岁月，冲破重重阻遏，渡过经费困难关，资料文字匮乏关，在当地干部群众和潮汕各地一批有卓识的新老领导同志的坚定支持下建成了。

澄海市是中国“文革”的重灾区之一，是“文革”危害的缩影，冤死了400多人（包括14位厅



广东澄海市“文革”博物馆2004年竣工照

级以上领导和名人)。被残害的这些人，曾经在潮汕大地上坚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又参与解放后的生产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没有被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炮所杀戮，却惨死在“文革”红色的屠刀下，还有4500人伤残，10余万人受株连。

二

“文革”博物馆位于塔园，那里山林环抱，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登高望远，大好河山，尽收眼底。进入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壁上铭录着1986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还有任仲夷同志“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的巨幅题词。园区在十三个山头上构建了“文革”博物馆、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心碑永矗、宝塔思安、明镜史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榕石真诚、孔圣宣仁、潮音伴月、童鹤戏春十三个风格各异的凭吊景点。

“文革”博物馆 庄重凝朴，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和著名诗人熊鉴的《文革十年祭》石刻碑文，矗立两边。沿石阶拾级而上，一座仿北京天坛造型、雕廊画栋、气势宏伟、庄重典雅的主题建筑“文革”博物馆呈现眼前。圆形大厅正中，是巴金老人的巨幅画像。坛殿四壁，嵌着大量图片石雕，展厅玻柜展有有关“文革”的报刊、书籍、资料、图片、实物。这里有打出“文革”信号弹的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报刊，有点燃“文革”烈火《5·16》通知，有打响内乱第一炮的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有矛头直指刘少奇为“文革”火上加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连续8次的接见，把年轻幼稚的红卫兵捧上政治舞台。有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大串联、大字报、大抄家、大破“四旧”、大揪牛鬼蛇神的图片和实物。夺权夺印、抢占档案、派别争斗、文攻武卫、忠字舞、红海洋、语录歌，还有一些刑具，让人们好像回到那个年代。

大厅里也有展示粉碎四人帮、审判四人帮场景的图片，以及1976年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批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三批罪行材料。还有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分别判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戚本禹、迟群、刘庆棠、聂元梓、张铁生等罪有应得的死刑（缓刑）、无期徒刑和15年至20年徒刑的图片和报刊。还有展示“文革”期间在澄海市故意杀害原地委副书记陈焕新、原副县长王鼎新、原县委副书记吴仁秀等10余人的凶犯陈德福被执行枪决的图片。

碑廊铭史 这个景点倾注着对汕头地区专员陈焕新等16位在文革中惨遭冤死的同志怀念哀思之情，铭刻着对文革的剖析与批判。

冤茔长青 这是一片墓园区，埋葬71位文革冤死者的尸骨，不能辨别身份的只能合葬。墓区砌建了台坛，树立石表，石表上镌刻“冤茔长

青”四个大字。

恸石志恨 在墓园山坡上一块倚山而立的大石上镌刻“恸石”二个醒目大字，凝重肃穆，直面冤茔。

心碑永矗 在园区中心一处心形大石上，镌刻着李锐同志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名句：“活在人心便永生”七个大字。颂扬胡耀邦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同时又借以怀念在文革中含冤死难的同志。

宝塔思安 矗立在墓园的山顶，钢筋水泥花岗石混合结构，高36米，七层，由著名书法大师陈大羽题写塔名。塔内各层壁面分别镌刻巴金、季羨林等10位名家批判文革的文摘及赠建者芳名。塔门树立任仲夷同志题词的碑石。塔的四周各有一座6米高的石塔，有4座寄托对含冤惨遭死难的陈焕新、王鼎新、杜美宗、朱荣桂的怀念。旁边有二副对联：冤骨埋荒山，今昭雪；喜拨乱反正，得安定。见塔如见君，浩气永留存；满园春色美，当可慰忠魂。

思安塔的建立，弥补了原来塔园（地名）无塔的缺憾。

明镜史鉴 在铜锣峰山坡上，依坡而上建了三座平台，一平台中间安一大石镜，两边安置十本石书，书面分别镌刻着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彭德怀、贺龙、季羨林、童竹君的图像，后屏为碑壁。二平台矗立叶剑英的铜像，威严如生，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粉碎“四人帮”，为安邦定国立下不朽功勋。三平台是史鉴山屋，收藏有关“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的纪实著作200多本，还挂满全国各地名家留赠的诗词书画作品。值得提出的是明镜台的石镜，概取“以人为镜，可以知善恶；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之义。

石笔书史 有三个平台，上平台矗立一柱巨大的石笔，直指蓝天，高10米，直径85公分，旁边安置一本未写上字的大石书。中平台竖一长碑壁，以全国作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终结文革》一文作为石笔峰记。下平台竖石笔峰碑，由杜应强先生题写，石笔石书蕴含秉笔直书之意，握起石笔在无字书上挥毫写下“文革”真史。

警钟长鸣 在峥嵘交错的岩石间，一座书写警钟长鸣四字的平顶四柱亭，四角各挂一口铜钟，象征警钟，亭中竖立德高望重的任仲夷同志

“我是纳税者”

黄范章

最近,媒体常谈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思想上有所触动。回忆起来,我心灵上第一次受到“民主意识”深深撞击的,还是80年代初我初到美国不久的事。那次心灵撞击,十分偶然,可谓意外收获。当时至少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我这点“民主意识”的领悟,来自一次漫不经心的聊天。我是1980年由社科院派送哈佛大学进修两年,不许延期,不许念学位,悉心进修经济学。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西方民主是“假的”、“伪善的”,因此我到美国后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涉猎“政治学”或有关的书籍或文章,也从未去听有关这些方面的讲演或研讨会,未曾料想到一次家常聊天中被一句普通谈话引发我对“民主”的深入思考。

第二个“没想到”是,我的这点“民主意识”,既非得自名人、学者的说教,也非来自政治家关于民主理论或民主制度的讲演或布道,却是得自一个普遍美国妇女——我在波士顿的女房东在党的十六大讨论会上发言的浮雕像,铭刻他“不能淡忘文化大革命”的警言。

还有纪念余锡渠同志的“思源仰余”亭和许士杰的“葑菲铭许”阁。他们都是早年参加革命,一生勤劳朴素,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

读完三千多条碑刻和对联,从上面凭吊区来到了天然岩峰上的“潮音伴月”景点。这里有两位石雕的潮乐老艺人,一拉弦,一吹呐,也许是在痛诉风雨肆虐,又像在喜庆云雾散尽日月重辉。

“孔圣宣仁”景点,有一座3米高的孔子石像,相峙的巍石勒记孔子在“文革”中被毁谤的事由。

最后来到“童鹤嬉春”景区。峰台上,一位女童,身着洁白衣裙,手托白鸽,在欢畅嬉戏。寒冬逝去,暖春来临,祝愿春天永驻人间!

一次漫不经心的聊天。

第三个“没想到”是,当时我们聊家常,根本没有任何严肃话题,整个谈话中甚至没有一句提到“民主”字样,而是她漫不经心的一句“我是纳税者”,寥寥几个字,却给我心头一震,沁人心田,通过自我内心活动,以思辨方式似乎领略到“民主”的真谛。

这里我介绍一下这段家常聊天的情节。

(一)“我是纳税者”

我和中国社科院另外4位同事有幸作为中国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分别到美国5个著名大学作访问学者,我更有幸进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和经济系,并在离学校只须步行15分钟路程的一家公寓租用一间住房,房东是杰奎琳·斯班尼太太,虽已离婚,带着一个初中男孩,仍使用丈夫的姓,与丈夫保持友好往

三

巴老已经远走了,他来不及看一眼第一座“文革”博物馆,但是他的期望却在粤东实现了。全国2000多个县、市的执政者,我想一定不乏像彭启安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勇士会起来鼓与呼,步“塔园”之后,建立起第二个第三个“文革”博物馆,谱写成一册厚实的中国“文革”全史。作为一名曾经为共和国诞生浴血的闽粤赣边纵的老战士,一名在“文革”中同样受难的幸存者,眼看战友们及其亲属的坟茔荻草、墓后的苍松翠柏和巍峨的纪念馆塔,我内心无法平静,特为之记,并以耄耋之年为之鼓与呼。

(责任编辑 吴思)

来。她实是二房东，替我从未见过的房东经营几间出租房，本人虽大学毕业，但只是超市售货员，是一个高学历低收入的普通妇女。

按照当时福特基金规定，我们在美国进修的两年间，可享用在美国内旅行一次优待，可用于国内观光，也可用于到其它城市作学术访问。我想用这笔旅费访问华盛顿的学术单位和著名学者，我的指导导师杜森伯里教授（曾任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还热情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去拜访几位学者及官员。此外，我还打算参观多处博物馆。

记得一天下午，我把我去华盛顿的计划告诉了房东斯班尼太太。她听了后建议，“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看，那就是国会，特别是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她又进一步说，她有时去华盛顿看望亲戚或度假时，总要找机会去看看国会的听证会。我当时一愣，不大相信她这话的真实性，因我眼前呈现出我国人民大会堂门前警卫森严的景象。我狐疑地问她，“警卫会让你进国会大厦吗？”我清楚地记得她当时一脸茫然表情，似乎对我的问题觉得奇怪或莫明其妙，立即高亢而爽朗地回答：“why not? I am taxpayer。”（“为啥不让进？我是纳税者。”）她当时讲这句话时那种坦荡豪迈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尽管在这次闲谈中根本没有讨论及涉及政治制度或“民主”之类的严肃话题或字样，但她“我是纳税者”几个字却铿锵有声，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一层层的思绪，至今仍萦绕于脑海，除了感受到她的“纳税意识”之外，更多的是她强烈的“民主意识”。

（二）“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

（1）“我是纳税者”首先触发我想到的是——一种“主人翁”意识。杰奎琳讲这话时，其豪迈的神气，使我似乎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白宫、国会大厦面前对他们大声说，你们（官员和议员们）是我们用税金供养的，我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是给我服役的。用几十年来国内妇孺熟知的一句词，就是是我“当家作主”。几十年来，我们听“人民当家作主”的教诲太多了，但人们还是觉得有点“雾里看花”，隐隐约约，还没有

成为百姓的“自我意识”。

（2）“我是纳税者”，还使我强烈感受到的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的“纳税意识”，是一种跟我当时头脑中传统的“纳税”观念截然不同。传统的税收观点，完全是一种“义务”，我国农民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缴纳“皇粮”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义务”，从不敢奢望“回报”，更不敢联系到什么“权利”。然而，“我是纳税者”这句豪语所透现的决不只是“义务”观念，而是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观念，甚至是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共同长期培育出来的现代“纳税意识”。在杰奎琳看来，尽管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蓝领职工，但她依法纳了税，就有权监督政府、议会是如何履行他们的职责的，有权知道和监视她缴纳的税金是如何花费的。我不知道杰奎琳过去在学校里是否有人专门给她灌输这个“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但她当时高亢地向我吐出“我是纳税者”几个字，我深感这完全是她下意识的反映，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

这种“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成了老百姓的自我意识，决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在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中长期培育而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初步建立，远未成熟，法制更不完善，更何况意识落后于存在，要培育现代“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决非易事。毕竟我国曾在封建社会中存在了数千年。至今在我国很多人的思想里，“当家作主”的自我意识并不高，封建社会长期滋生的“清官好皇帝”思想仍很流行。“包青天”、“少年包青天”、“狄仁杰”、“康熙微服私访”等等一再播放的影片，有意无意地宣传的还是“清官好皇帝”之类“人治”观念。“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报刊、电视中经常作为正面思想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有不少官员也常以此来“自勉”或“自豪”。从一定意义上讲，其积极意义在于要求干部（官员）要“心有百姓”，要事事为群众着想，但归根到底，它是要“官”替“民”作主，不是百姓自己“当家作主”。

（三）公共财政与民主机制

由“我是纳税者”所透现的“当家作主”意识,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因为存在某种“机制”,使“纳税者”能亲身地感受到可施展其“当家作主”的职能。据我个人旅美(先后两次共4年)的观察与生活体验,这和“公共财政”及“民主”机制有关。

在市场经济下,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赖以生存和运行的经济基础。在西方,政府作为一国的政治实体,除履行国防、外交、公安、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服务外,也具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1)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2)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垄断,确保公平竞争;(3)实施宏观调节(由中央政府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承担);(4)支持社会保障,提供一般福利设施。政府这一切的活动的经费全部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这样,政府便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财政被称之为“公共财政”,其收入来源就是来自广大“纳税者”公众所缴纳的税金。

“我是纳税者”所体现的“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一方面表明是我们纳税者公众用税金供养了政府,但更重要的一面是“纳税”的义务也赋予了“纳税者”制约或影响政府的“权利”,但如何确保“纳税者”具有行使“制约”、“影响”政府的权利呢?这个重要问题在一般经济学、财政学的课本中是不讨论的。我的观察,政府的活动以及“官员”及“议员”的决策是否得当,除了舆论的监督外,重要的是“议会制”、“选举制”提供了这类制约机制。

据我看到的是,政府(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重大举措、活动或重要官员任命,都要受到相应议会的制约,议会常举行各种听证会来审议政府的动议,而且许多听证会是对公众开放的,但一般听众只能在楼上静静地听、看议会的进行,不许干扰会议。当然,在会议中往往夹杂了党派斗争,但有一好处,是“透明”,使公众享有“知情权”。而且还有“问责制”,不仅议会对政府(或官员)的错误决策要“问责”,而议员在议会中的表现也是公开的,记录在案。如果说议会制约着政府,那么选举制给公众(纳税者)提供了制约议员的机制。据我房东及华裔朋友告诉我,议员跟

当地居民常有联系,议员的办公室电话号码是公开的,当地居民有什么意见、要求可打电话约见议员,议员都有规定时间接待来访者,议员受理后会跟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并负责定期反馈。而议员所要求于居民的是“选票”。我旅美期间,曾多次碰上议会选举,在竞选期间我常看到竞选者本人长时间地站在街心花园竖立的横幅标语牌下面,标语上写着“请投我一票”及本人名字,而竞选者则衣冠楚楚地站在那里跟所有过往车辆摘帽致意。选民并不是根据他在竞选期间的表现,而是根据他平时在议会或其它工作中的表现及业绩(政绩或劣绩)来决定是否给他投下神圣的“一票”。这“一票”就是“纳税者”手中掌握的“制约”机制,就是他履行“当家作主”的职能。

有了这一套“制约”机制,“公共财政”才能成为现实、完整的体系。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已有多年,但为什么还常出现“重复建设”、“形象工程”、“首长工程”呢?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公共产品与服务多集中于城市而疏远于农村和偏远山区?有的地方官员两眼只看上面,只追求一时政绩,而不顾及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既无听证会,更缺问责制,照旧可以易地升迁。百姓对此无可奈何,更无能为力。今年两会有较明显改进,不仅政府决定加大对农村及落后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医疗、教育及基础设施)的力度,而且“人大”决定率先使用电子政务,用先进技术来增大“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代表、委员们直言直陈,提出奥运的鸟巢工程、国家大剧院工程的浪费性及不安全性。国外媒体说“橡皮图章硬起来”,表明民主改革有所进步。

现在人们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们的观点虽给人启发,但我还是同意毛主席说的“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而我更重视“手段”;手段包括“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种机制,机制的建立需要有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社会设施等各方面的条件,特别要加强的是自下对上的“制约”机制。只有机制完备了,民主的目标才可达到。我们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坚持不懈地逐步推进。

(责任编辑 吴思)

法国知识界认识文革的历程

——专访法国汉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先生

陈 潇 郭冬至

问:先生,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简单谈谈您是如何了解中国文革的么?

答:我从年轻时(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资料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文章、传记,后来作为专业人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很早就成为中法友谊协会的会员,在改革开放前曾经两次来中国访问,亲身体验和观察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回国后也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文革的文章。可以说我是一个中国文革的热心研究者。

问:年轻时代您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印象如何?是不是也非常崇拜?

答:当时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完美的,我把他看作一个理想的、伟大的领袖,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当作最美好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当时整个法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以十分理想化的眼光看待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新中国。法国报刊媒体发表了大量称赞和支持毛泽东的文章,大量转载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知识分子也都把中国当作一个理想社会来评价,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好,而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几乎没有。当时在我们眼里,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的国家。

问:这么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你们当时还不很了解中国?

答:是的,因为当时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我们能看到的来自新中国的报道十分稀少。除了有一些美国记者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

在延安的政治风貌以外,我们没有专门的渠道去直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实际情况。直到很久以后,1971年,有一个意大利女作家Maccivicchi去中国访问,回到欧洲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才算是有了比较好的第一手的材料。这篇文章仍然是在夸赞中国是如何好、如何开放和民主,但在当时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就是因为只有这些凤毛麟角的消息,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就十分简单,也就更容易把它想象得完美。

问:为什么单单对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有这样广泛的推崇?

答: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正在经受一场危机,很多人不再相信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欧洲人需要一种新的道路、新的办法,去解决他们面前的巨大的社会难题,同时也需要一个理想中的榜样。法国历来是一个左翼政治力量很强大的国家,法国共产党战后势力正盛,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对政府不满,同情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远在天边的新建立的中国政权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成了新道路的理想模型。

问:您当时曾经亲自来中国访问,印象如何?

答: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54年,当时学校里组织中法友谊协会,会员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我主动报了名,被选中了。我们一行几十人来到中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之后由政府安排,参观了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合作社。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农业生产状况,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之前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中国政府

对我们十分友好，那次访问也很愉快。回国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盛赞中国的进步，同时也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中国。

问：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对待苏联和对待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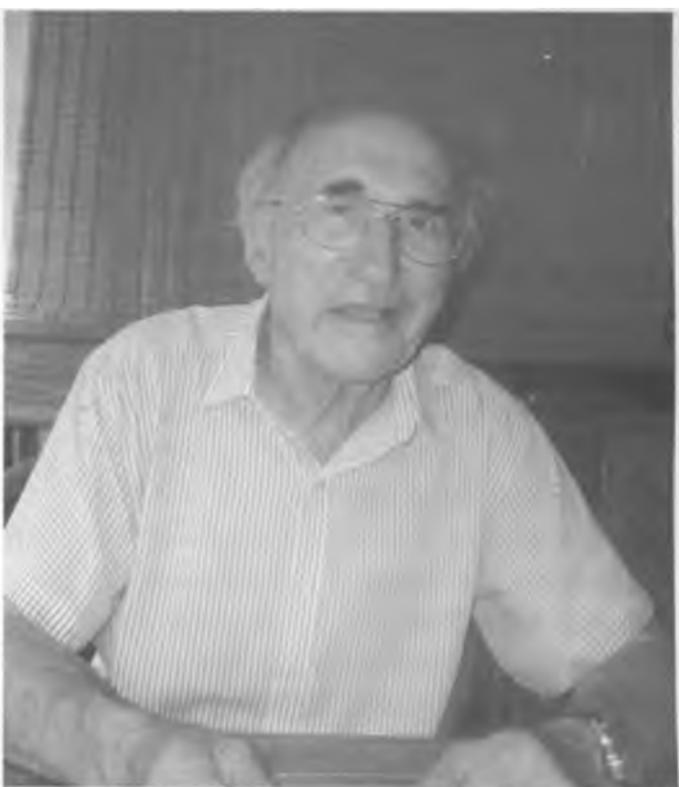
答：那是因为我们太了解苏联，而又太不了解中国了。欧洲当时已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共处了几十年，而且我们和俄国离得很近，历史上就多有交往，有大量来自苏联的信息。但对新中国，我们只能靠支离破碎的信息去想象。1957年，当时听说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毛曾经批评官僚主义，批评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弊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半年以后，听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却不太愿意相信。1967年1月，有人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叫《文革的来源》，描写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权力斗争，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事实上我们当时仍然对中国的模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所以即使听到了一些负面消息，也根本动摇不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还是觉得文革是追求平等，是打破官僚主义，是很好的东西。

问：但是斯大林也曾经批评过官僚主义。

答：是的，但是我们对斯大林的那一套很熟悉。他如何在苏联施行独裁、掌握权力、压迫民众。但当时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类事情发生在毛身上。所以我们把毛当作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两类领导者，斯大林和他的苏联是邪恶的，而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进步的、民主的。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国甚至在外交上与苏联决裂，这些更使我们确信他与斯大林不同，也反过来加强了我们对他的理想化思维。甚至当时法国总统 d'Estaing（德斯坦，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都曾经说，毛泽东是世界的一座灯塔。

问：这样的想法是何时开始转变的？

答：天主教会大概是比较早开始批判文革和毛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大陆对天主教的迫害，消息传来中共迫害宗教自由的做法让不少法国人比较吃惊。就我个人而言，一直到1972年，我听说前一年中国当时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坠机而亡。当时这个消息还是比较确切的，所以我开始



毕仰高先生接受采访

产生了怀疑，开始想原来新中国这样美好的国家也会有肮脏的事情，政治斗争如此险恶。正因如此，两年以后，我再次借机来到中国，我要再亲眼看一看中国20年间的变化，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

问：你第二次来华证实了你的怀疑么？

答：这次的经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十分失望。当然，今天看起来丝毫不奇怪。有一天我去工厂里采访，墙上写着“批林批孔”等等的标语，我照了相。晚上回到旅馆，我们的导游来找我，说我照相工厂里的工人群众会不高兴。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只有厂长书记才会不高兴。他没收走了我所有的胶卷，我在那之前所拍的照片全都没了。那时中国的风气与50年代完全不同，我走在北京的街上问路，中国人都不敢跟我这个洋人说话。我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直到在广州机场上飞机之前，别人都已经走在前面很远，我还被留在关口，我被迫打开皮箱让工作人员进行搜查。这次访问使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反思。回到法国后，我为《世界报》撰写了一篇文章，通过讲述我这次经历，提出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可是这些批评在文章发表时大

半被删除了。编辑告诉我,这些内容是不能刊登的。要知道,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传媒界长年累月地批评本国政府,而我却不能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政策。后来我写了一篇发在《Spirit》杂志上谈到中国的见闻,叫《杯子里的旅行》,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

问:怎么攻击你?

答: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崇拜几乎是一边倒,各大报的主编也几乎是这样的,你都很难相信,那时的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法国总统可以,骂毛泽东绝对不行!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世界报》征集文章纪念他的一生,也向我约了稿。我专门写了一篇带有一些批评意见的文章。最终登出来的文章总共有9篇,其中8篇是赞扬毛的,全部登在头版,而我的那篇被埋在报纸中间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没有办法,到70年代法国支持毛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我们当时有几个人,对文革和毛的政策有所批评,刚好可以凑出四个人,结果被称作“四人帮”。(笑)

问:为什么当时法国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们,尤其像萨特这样的大师,也会受到这么深的蒙蔽,去发表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

答: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毛病,总是喜欢对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大发议论,而且充满了幻想。早在17、18世纪,他们就把当时在康熙、乾隆等皇帝治下的中国说成是一个太平盛世。20世纪他们对共产党中国也是一样的,萨特特别支持毛泽东和文革,波伏娃也写过一本《中国大长征》。他们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总是要在地球上寻找一片极乐世界。而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问:法国的主流舆论是何时开始改变看法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答: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法国。1977、1978年,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这时法国大众才开始了解真相,才明白他们以前对中国的看法有多么不切实际,突然发现原来中国是个和苏联差不多的国家。于是全国的舆论有了一次急剧的转变,从之前的一边倒地支持毛和共产党中国,到一边倒地开始批评他们。法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带着国际主义和理想主

义的情绪,所以他们太容易接受极端化的想法,往往之前是一派论调,过了不久就完全跳到相反的立场去了。离毛去世不过几年,法国的舆论就完全成了一片批评中国和毛的阵地,到处都是对中国革命的批评,还有很多对毛的负面评价,甚至有很多矫枉过正的说法,说什么毛从小就道德败坏、利欲熏心,而很多共产党建国中真实的艰苦奋斗和牺牲都不提一句,这样极端的观点我从来不同意。当时也出现了几本毛的传记,比如英国记者,Philip Short的,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还有Chang和Halliday合著的,也不错。但总的来讲,70年代后期完全是一次舆论大逆转,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问:最近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大陆一些媒体有不少人引用欧美朋友的话,广泛宣传说现在欧美人仍然十分推崇文革和景仰毛泽东。

答:据我所知完全不是这样的。有一些艺术品往往以文革为题材,但那不是出于崇拜,主要是拿革命现实主义开玩笑,至少现在法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支持文革和毛泽东,也许有个人,但不可能是主流知识分子,报刊媒体很少刊登有关的文章,大众对这些也不再关心,甚至法国共产党现在在法国的名声也很不好,大家觉得他们宣扬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总之,今天绝对很少有人再歌颂文革了,也没有什么人再去赞扬和支持毛了,而是更多地把他和斯大林作为比较,把文革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实际上,这才是一种正常现象,那种理想化的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有不少深入事实的作品。我们曾经认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革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不等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是被入侵的外敌逼出来的。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苏联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弊病,比如像毛在文革中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去告诉民众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些本来都是不难想到的。了解的加深使我们的看法完善起来,再也不会把毛这样的领导人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了,我们把文革也作为一个国家惨痛的教训。

(毕仰高先生毕业于巴黎高师,后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为法国知识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领军人物)

(责任编辑 吴思)

欢迎订阅2007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售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我在全国人代会上犯错误

钱三强三次受挫

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

胡宗南的未遂起义

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为何失败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